

## 情報與外交： 從檔案論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1937-1946）

廖文碩\*

### 摘要

本文主旨為運用中英美官方檔案，探討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王芃生主持國際問題研究所，於國民政府戰時情報系統整合過程中，其主管任務與角色定位，同時為因應日軍封鎖中國國際運輸，以及日軍轉向南進與緬、印戰略地位提升，有關西南國際戰略通道之情蒐，與法屬越南、泰國、英屬新加坡及緬甸等當局多方交涉；其次探討王芃生策動滇緬路開放之後，對緬、印反日宣傳之投入；最末討論王芃生與英國特勤處對日情報與宣傳合作始末，國研所於中國政情動盪與美、英盟國實力消長格局下，擴展對外合作面臨的內外困境，從而析論王芃生領導情報工作在戰時國府外交實務上可能發生的作用，及其所反映國際情報政治運作的特質。

關鍵詞：王芃生、國際問題研究所、英國特勤處、隱蔽外交、情報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本文為科技部 105 年度「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赴英國國家檔案館蒐集資料之部分研究成果（補助編號：105BAB04001），運用中文檔案之初稿曾於 2015 年 8 月 28 日國史館、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主辦之「近代中印關係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宣讀。感謝呂芳上、朱雲漢、Rana Mitter、Tansen Sen、朱滋源、李登科、李君山諸位教授的熱忱提攜與指教，以及二位匿名審查人的悉心斧正。

## **Intelligence and Diplomacy: An Archival Study of Wang Pengsheng and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7-1946)**

Liao, Wen-shuo\*

### **Abstract**

This paper draws mainly upon government documen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examine the work accomplished and the role played by Wang Pengsheng in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KMT Government. Wang led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R)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hiang Kai-shek in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all-out war against Japan. He was responsible for collecting international intelligence concerning the strategic status of Burma and India in the midst of intensifying Japanese military advance, and participated in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among French Indochina, Thailand, British Singapore and Burma. Secondl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volvement of the IIR led by Wang Pengsheng in anti-Japanese propaganda in Burma and India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Wang's activities upo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plan concerning its cooperation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ies of its allies, mainly the British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 It discusses to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hardships suffered by the IIR during China's political turmoil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anging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America. Through these analyses, this paper delineates the practical impact of Wang's work o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pragmatic diplomacy during the war as well as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ecret service.

**Keywords: Wang Pengshe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R),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 Clandestine diplomacy, Intelligence**

---

\* Associate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Research and Compilation, Academia Historica

## 壹、前言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變之後，中日糾紛的長期未決與擴大化，面對國際間綏靖主義當道，國民政府在外交上首先堅持中日問題國際化「國際解決」戰略應對，隨著歐洲英法與德義兩大陣營形成並走向決裂，1938 年國府明示「聯合世界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的外交基本方針，1939 年歐戰爆發後再提出將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同時解決的抗戰目標，至 1941 年珍珠港事變後中美英同盟的確立。結盟問題為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的核心議題之一，對中日戰爭時期的中國而言，外國盟邦或支援能否到位攸關存亡，戰時國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尤以求援及結盟實踐為其主要策略，過去學界已有相當深入而廣泛的研究成果，多以領導決策者與外交體系本身為探討對象，著重於國際現勢互動的政治格局。<sup>1</sup> 然而，傳統外交體系與正式管道之外，情報機構及有關人員的情蒐工作、在外交決策與執行上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外交情報戰於總體戰爭的意義與影響，相關研究仍較為少見。

戰時外交與情報活動密切相關，因性質機密，其所謂「隱蔽外交」(clandestine diplomacy)——情報人員透過暗中而秘密的情蒐、偵察、策動等任務，影響外交決策與國際事務，駐外使領館往往成為情報人員或特務行動的掩護，在實質上、若非全然地仰賴情報人員，達成與對手國家的外交解決。隱蔽外交屬「秘密外交」(secret diplomacy)範疇，與「情報策動外交」(intelligence-driven diplomacy)強調在談判情境中，情報對外交人員的輔助功能有別，而是由情報社群實際行使外交職能，通過「暗藏之手段」改變世界，其於外交實踐所扮演之角色，長年為外交史研究遺失的一環。另一方面，西方情報學近年從探討蒐集、分析與運用情報之過程，擴大檢視隱蔽外交等各類秘密行動，為開拓並深化情報史研究，提供過去為人所忽略、卻引人入勝的層面與分析架構。<sup>2</sup>

---

<sup>1</sup> 近期研究舉其要者包括：鹿錫俊，〈國民政府對歐戰及結盟問題的應對〉，《歷史研究》，第 5 期（2008），頁 94-116；王建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外交戰略與對外政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

<sup>2</sup> Len Scott, "Secret Intelligence, Covert Action and Clandestine Diplomacy,"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2, 2004, pp. 322-341; 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 *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近年來拜檔案史料開放之賜，證實隱蔽外交在國際交涉過程與結果發揮重要功能，而歐美戰時在華情報活動與情報戰等史事，相關研究已風氣漸開。<sup>3</sup> 2001年由英國學者方德萬（Hans van de Ven）主編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期刊專號，運用中西方檔案探討二次大戰期間盟國在華情報合作與國府情報工作發展的諸多面向，進而重新評價國府於二戰的世界性貢獻與角色，並析論龐雜的特勤單位與人事競合關係，導致國府高層內部相互猜疑、齟齬，進而撼動政權。<sup>4</sup> 而國府戰時情報機關之一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以下簡稱軍統局），近期也因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與國史館的合作公開並出版解密檔案，有關研究陸續發表，相當程度修正了過去中國大陸與西方對軍統局及其領導人戴笠的刻板認識。<sup>5</sup>

由知日專家王芃生所主持「國際問題研究所」（以下簡稱國研所），直屬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與軍統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以下簡稱中統局）等，並列為對日作戰時期主要情報機構。王芃生（1893-1946），湖南醴陵人，本名大楨，以字行，早歲參加辛亥革命，後赴日求學，入陸軍經理學校、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致力於日本外交政策與國際情勢研究。歸國後歷任國民革命軍司令部參議、東北外交研究委員會委員、駐土耳其公使館及駐日本大使館參事。全面對日作戰初期奉命創辦國研所，並歷任交通部常務次長、軍委會最高調查委員會委員、國防最高委員會外交專門委員、國防最高委員會國際問題討論會組員。對日作戰後期蔣王關係漸趨疏離，未幾王芃生卒逝，國研所由侍從室邵毓麟、唐縱負責遣散。

相較於戴笠與軍統局，學界至今對於王芃生與國研所的研究仍十分有限，近期有劉曉鵬專文研討，主要運用坊間已出版之回憶錄性質史料，將國研所視為對日作戰時期蔣中正的「智庫」，扼要勾勒了該所作為政府遷臺以後國民黨智庫國際關係

---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55. 如 Len Scott 所言，隱蔽外交的重要性，在於情報社群得否認參與國際會談或交涉，並能規避官僚體系的抑制機制，相較於外交體系具有維持機密的內在優越性。

<sup>3</sup> 舉其要者包括：Maochun Yu,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Bernard Wasserstein, *Secret War in Shanghai: An Untold Story of Espionage, Intrigue, and Treason in World War II* (Boston, Mass.: Houghton Mifflin, 1999); Richard J. 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Secret Servi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tony Best,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the Japanese Challenge in Asia, 1914-194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sup>4</sup>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4, 2001 專號收入畢可思 (Robert Bickers) 探討二戰末期英國特勤組織在華秘密行動、余茂春探討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中英合作培植游擊隊員的「中國別動隊」(China Commando Group) 計畫等各篇。

<sup>5</sup> 吳淑鳳等編，《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臺北：國史館，2012）。

研究中心之「前傳」，包括其成立、組織編制、改制失敗及撤廢，使用資料與視角有所侷限。<sup>6</sup> 近年西方學界探討二次大戰時期英國「特別勤務處」(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 以下簡稱特勤處)在亞洲情報工作，對於該機構人員與國研所合作略有著墨。<sup>7</sup> 馬振犢、邱錦運用檔案撰文探討中日戰爭時期中統局對英合作，文末一節簡述特勤處在華工作，惟該文在外文資料解讀上錯誤不少，如將國研所之另一譯名 II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誤以為軍統局，將國研所與特勤處之合作單位資源調查所 RII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Institute) 誤以為國研所。<sup>8</sup> 方德萬也指英國國家檔案館藏《特勤處檔案》(Records of SOE) 所見王芃生的相關資料僅是斷簡殘編，仍有待學界進一步考掘、爬梳檔案史料，以還原王芃生的戰時活動與國府對日情報掌握實際情形，增進吾人對二戰史的全面認識。<sup>9</sup>

王芃生以其豐富的日本知識與人脈、精確情報分析與獻策，在中日全面戰爭前夕嶄露頭角，身負重任，對於日本走向南進的全面擴張政策與戰事推移，頗有掌握與因應。王芃生雖具外交資歷，卻非傳統外交體系出身，熱中著述，卻難以學者定位，其於國研所之工作任務，更接近以戰時情報機構領導者身分，參與外交及國家安全事務。國研所撤廢後，檔案並未完整保留，相關資料分見於各檔案全宗，本文主要運用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館藏為數不少由王芃生與國研所呈報之秘要報告、情報提要、函電等資料，輔以中外文檔案史料，於前人研究基礎之上，期能對王芃生所主持情報工作在戰時國府外交實務上可能發生的作用，及其所反映美、英盟邦競合下，國際情報政治運作的特質，有更深入的認識。

<sup>6</sup> 劉曉鵬，〈敵前養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前傳，1937-197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2 期（2013），頁 145-174。

<sup>7</sup> 如前述 Richard J. 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等。中文學界如劉曉鵬一文僅約略提到英方在國研所曾派駐顧問室。特勤處係二戰時期英國政府為於敵占區秘密進行破壞、顛覆與協助當地反抗組織行動，1940 年中由經濟作戰部部長負責籌組成立，並由一集合政府相關部會局處首長及軍方領導階層之委員會維持運作，至 1946 年初解散，所設秘密組織、軍團等勤務工作橫跨歐亞。

<sup>8</sup> 馬振犢、邱錦合撰，〈抗戰時期國民黨中統特工的對英合作〉，《抗日戰爭研究》第 3 期（2006），頁 160-192，尤其是頁 186-192。國研所多英譯為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R)，英方檔案亦有稱 IIS 者。參見 Richard J. 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 282。

<sup>9</sup> Hans van de Ven, "Introduction,"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4, 2001, p. 7.

## 貳、檔案所見國研所成立經過及其主管任務

國研所的成立時間，一般沿用舊部潘世憲指稱，1937年5月15日為該所「成立紀念日」的說法，惟檢視官方檔案，並無資料佐證。<sup>10</sup> 從王芃生在軍委會侍從室的人事登記片則可見，蔣中正早於1936年11月已任命王為國研所主任。<sup>11</sup> 王之受命緣由，眾說紛紜，有謂蔣在九一八事變後經張學良介紹與王面談，大為欣賞，即有意任用；或云蔣在西安事變前夕接悉外交部轉呈王破獲之兵諫情報，而決定重用。<sup>12</sup> 依潘世憲所言，則是王在七七事變前夕，透過外交部轉呈蔣中正一份秘要報告，對日本逐步擴大侵略意圖提出警告，蔣召見王後，即命令其組織一個對日情報機構，並派王留日時期舊識龔德柏及軍統局、中統局人員協助創辦。<sup>13</sup>

國研所所務著重蒐集日本情報，以及對日問題的研究與探討，為敵情及敵國關係最高調研機構，與對日作戰時期國府眾多情報機構，包括軍統局、中統局、技術研究室、軍令部第二廳、外交部情報司等共存，有其專司特長。然而情報機構紛立，工作性質近似，為刻意區隔，致各立山頭、各自吸收人馬，彼此競爭摩擦，勢所難免，亟需加強各機構間之溝通協調，以收分工合作之效，侍從室於此逐漸發揮重要功能，學者張瑞德近期已有詳論。<sup>14</sup> 過去研究未曾指出的是，1938年軍統局在改組成立前後，戴笠為求統一指揮特務工作，國研所成立未幾，即已面臨可能被軍統局整併的命運。

按中日全面戰爭以前，國府情報機構最早由陳立夫奉蔣命創辦、長期主持，戴笠以後起之姿，逐漸分庭抗禮。陳立夫於1928年創設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為中統局原始機構，戴笠自1932年2月領導之力行社特務處則係軍統局前身。1932年9月蔣中正為整合情報系統，設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非前述之軍統局），陳

<sup>10</sup> 潘世憲，〈國際問題研究所概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第14冊特工組織，頁916-917。

<sup>11</sup> 「人事登記片」（1944年），〈王芃生〉，《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國史館藏，129000001718A。

<sup>12</sup> 劉曉鵬，〈敵前養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前傳，1937-1975〉，頁149。引用的是國研所主任秘書龔德柏和潘世憲的憶述。

<sup>13</sup> 「王芃生呈秘要報告」（1937年5月15日），〈日本對華軍事外交情報（五）〉，《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001-066201-00006-000。

<sup>14</sup> 張瑞德，《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頁71-136。

立夫出任局長，置第一至第三處，分由徐恩曾主管黨派調查、戴笠主管軍警調查、丁默邨主管郵電檢查，陳、戴仍各自活動，第一、二兩處在交通器材配備、調查工作對象、各方面人員布置上，頗有疊床架屋現象，該局成效流於工作匯報形式，與蔣原意相去甚遠。<sup>15</sup>

1938年國府中樞重要機構移駐武漢期間，陳立夫為就教育部長新職請辭調查統計局長，依據戴笠6月呈蔣中正報告，蔣於5月手諭：「特務工作之組織方案，應特加整理與改良，應劃分性質，如軍事、外交、經濟、財政、黨務、社會團體等，又劃分地區，以及縱橫聯繫方法等，又人選重要，各部分主持者，可作一整個方案詳報。」戴笠報告即主張歸併第一、二兩處人力財力，撤消其名稱，將全國特務工作集中於改組之軍委會調統局，自請出任副局長，國民黨中央黨部調統局則純為考核黨員、整頓黨紀之機構，以杜絕矛盾流弊。<sup>16</sup>

6月，蔣中正諭示籌組最高調查委員會，自兼會長，由該會直接處理全國各調查機關之聯繫與統制事項，同時規劃改組並擴大調查統計局之組織。<sup>17</sup>7月，王芃生向蔣提出國研所工作計畫及擬擴大工作之新預算，並以尚未改組之調查統計局依組織規程並無辦理國際情報職權，呈請將國研所撥歸直屬軍事委員會管轄，以便照常工作。惟戴笠既有構想將特務工作統一於單一機構軍統局辦理，對於國際情報職權亦有意爭取，主張將國研所改為軍統局國際情報處，與王芃生產生矛盾。

7月，戴笠再呈蔣報告，指陳王芃生先在最高調查委員會籌備會議席上，當眾表示願意將其主辦之國研所歸併調查統計局，戴笠為使王芃生暢所欲言，派曾與王在土耳其、日本兩使館共事之調統局第二處國際股長曾廣勛代表前往洽商，得結論二項：其一，王芃生以國研所組織與一般情報機關不同，人事布置、經費等均採地區包辦制，因友誼關係恐他人難以指揮，改「處」之事須從長計議，故目前須在調查統計局本部組織中成為一獨立「所」；其二，該所如改隸局本部，王芃生同意仍

<sup>15</sup> 張國棟，〈中統局始末記〉，徐恩曾等著，《細說中統軍統》（臺北：傳記文學，1992），頁1-43；王禹廷，〈中國調統機構之創始及其經過〉，徐恩曾等著，《細說中統軍統》，頁7-20。

<sup>16</sup> 「戴笠呈蔣中正報告」（1938年6月6日），〈特種情報——軍統（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80102-00034-003。

<sup>17</sup> 「最高調查委員會組織規程暨處務通則草案」（1938年），〈特種情報——軍統（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80102-00034-004。

任所長，然而如將該所改為國際情報處，王則不願屈任處長，但同意擔任局本部高等顧問，並推薦楊宣誠為處長人選。<sup>18</sup>

8月，調查統計局正式改組，由原三個處分別成立三個情報機構，與戴笠6月所呈方案有相當差距。原第一處黨派調查業務與人員，歸交中央黨部，成立中統局，朱家驊、徐恩曾任正、副局長；原第二處則擴大為軍統局，賀耀組、戴笠任正、副局長。中統局、軍統局均直隸最高調查委員會，由蔣督率，軍統局及中統局之正副局長、侍從室主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及中央黨部秘書長為該會當然委員，並預定由國研所主任王芃生出任該會辦公廳主任。<sup>19</sup> 武漢撤守後，最高調查委員會因故未能延續，國研所仍直屬軍委會。<sup>20</sup> 1939年冬至1940年秋期間，王芃生尚曾幾度作態，分別向戴笠、侍從室唐縱表達願放棄工作，將國研所轉讓於戴笠，戴笠則答以萬不敢有歸併之意，彼此暗中角力、較勁意味濃厚。<sup>21</sup>

依據王芃生多位舊部回憶表示，國研所在武漢進行重組後，其組織始告完備，共設有第一至第三組分別負責敵偽情報、國際情報、圖書資料，以及秘書室、總務組、機要組、專用無線電台，外勤包括設在各戰區、敵後和海外的的工作網點，其情報人員活動足跡，遍布港、滬、平、津等重要城市，以及歐美、印度、緬甸、越南與日本等海外地區。<sup>22</sup> 此外，王芃生並延攬日本反戰革命人士青山和夫，1937年6月到所擔任顧問，後成立青山研究室，任用數名日籍助理研究員，協助研究日本各種情形。<sup>23</sup> 1942年為進行對英情報合作，復成立顧問室，本文第肆部分將再詳論。

<sup>18</sup> 「戴笠呈蔣中正報告」（1938年7月），〈特種情報——軍統（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80102-00034-003。

<sup>19</sup> 「最高調查委員會組織規程暨處務通則草案」（1938年），〈特種情報——軍統（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80102-00034-004。

<sup>20</sup> 「戴笠呈蔣中正」（1940年），〈特種情報——軍統（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80102-00035-001。

<sup>21</sup> 「戴笠電王芃生」（1939年11月7日），〈戴公遺墨——其他類（第3卷）〉，《戴笠史料》，國史館藏，144-010199-0003-001；「戴笠電王芃生」（1940年5月8日），〈戴公遺墨——其他類（第1卷）〉，《戴笠史料》，國史館藏，144-010199-0001-064；唐縱，《蔣介石特工內幕——軍統智多星唐縱日記揭密》（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頁97。1939年2月，侍從室成立負責情報業務的最主要單位第六組，5月唐縱被蔣任命為組長。有關侍從室的組成，張瑞德，《無聲的要角》，頁72-74。

<sup>22</sup> 陳爾靖編，《王芃生與臺灣抗日志士》（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袁孟超、郭福生、潘世憲等各篇憶述。據潘世憲所言，1942年王芃生曾報請增設第四組（研究組），以謝南生為組長，潘世憲為副組長，惟未獲批准，參見頁42。

<sup>23</sup> 依據1942年5月國研所為負責監管敵國人民事，函送該所列管日籍職員名單，除顧問青山和夫外，尚有9名助理研究員。「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致外交部公函」（1942年5月23日），〈中國境內敵僑俘處理案（一）〉，《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020-010118-0002。

國研所經費由侍從室撥發，直接受命於蔣，與侍從室、參事室、軍統局、技術研究室等，同屬軍委會委員長直屬機構。<sup>24</sup>

上述為督導各情報機構之最高調查委員會既未延續，侍從室因處理各方呈送情報資料，形成以侍從室為中心之情報體系運作，對國府情報工作整合發揮重要作用。<sup>25</sup> 1942年7月，國府實施各情報機關服務規章，明定業務分配（如表一），規定每月月終須檢討工作，並將結果呈報。隔年2月蔣復下令侍從室第一、第二處主任林蔚、陳布雷，召集中統局、軍統局、國研所、技術研究室各負責人，再次檢討各情報機關之內部組織與工作，以配合業務推進，加強工作效能。依據服務規章，國研所主管業務，含日本政經、社會等各方面國情，尤其著重日本國防國策及其對同盟國家之影響層面，以及日本之國際關係；其他與日本直接相關者，包括敵偽組織之偵查、制裁事項由軍統局主管，日軍軍事情報則由軍令部第二廳主管。<sup>26</sup>

機關名稱	主管任務
中國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	1. 各級黨部之秘密監察以及社會上之思想、警察各事項 2. 中央與各黨派之偵查及抑制各事項 3. 政府各機關之行政設施奉行命令以及貪污腐化、違反法令諸事項 4. 經濟調查及有關經濟檢察之事項(該局原有經濟調查處組織)
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1. 本國各部隊人事、經理、教育、衛生、軍風紀、貪污不法諸事項 2. 敵人、漢奸偽組織之偵查、制裁事項 3. 防制間諜之活動及各種檢查事項 4. 有關經濟檢察事項

<sup>24</sup> 「軍事委員會呈國民政府該會及所屬機關組織法規編制請鑒核備案」(1945年2月16日)，〈軍事委員會組織法令案(六)〉，《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001-012071-0195-000。軍委會以委員長各直屬機構均有編制，或係機密，或因業務隸於部以下但冠用該會名稱，故未檢送國府。

<sup>25</sup> 張瑞德，《無聲的要角》，頁72-74。

<sup>26</sup> 「林蔚、陳布雷呈蔣中正報告」(1943年4月26日)，〈全面抗戰(二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80103-00054-007。

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敵國之政治、財政、金融、經濟、社會動態、重要人物、政治團體，以及其國防國策與對我及同盟國之政治、經濟、文化侵略有關之重要事項</li> <li>2. 敵國與國際關係</li> </ol>
軍令部第二廳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敵國之動員陸軍、艦隊、航空隊之編制、裝備、訓練、配置、調遣番號數量，以及對我與同盟國用兵作戰有關之諸事項</li> <li>2. 蘇聯之動員軍隊之編制、裝備、訓練、配置、調遣作戰有關之諸事項</li> <li>3. 英、美及各國之軍事動向</li> <li>4. 國際上各種戰況</li> </ol>
外交部情報司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英、美及其他各國之政治、經濟情形</li> <li>2. 蘇聯之政治、經濟，以及第三國際對我有利或不利之諸事項</li> </ol>

【表一】中央各情報機關業務分配表

資料來源：「林蔚、陳布雷呈蔣中正報告」（1943年3月9日），〈全面抗戰（二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80103-00054-007。

國研所上呈情報文類，包括「情報摘要」、「研究報告」、「參考資料」、「歐戰要報」等，其中前二種在經過批准後，一般即分送美、英、蘇、法各國駐重慶使館武官。<sup>27</sup> 對日作戰時期侍從室經由整理判讀、審核、呈報、追蹤及稽核各方情報，依據情報進行分析與對策研議，尤其在蔣中正有效控制戴笠坐大後，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唐縱得以逐步建立對各情報機構的監督管理與考核機制。依據現存侍六組處理各情報機構所送情報之統計，與其他機構相較，國研所情報被侍從室原件呈閱者較少（1940、1944年比例分別為23%、22%，1944年比例最高之軍令部第二廳達65%），逕交主管機關參考辦理者尤其偏低（1940年為8%，1944年為15%），而存查比例則相當高（1940年為69%，1944年為63%），但全未遭焚毀。<sup>28</sup> 侍六組審核各情報機構報告，對國研所有「報告偏重於研究，對於敵國政治、經濟情形報告較少，

<sup>27</sup> 潘世憲，〈回憶王芄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陳爾靖編，《王芄生與臺灣抗日志士》，頁47。

<sup>28</sup> 遭焚毀之情報為消息已見報端、已失時效、瑣細或不真確者，各機構中以技術情報室報告遭焚毀之件數最多、比例最高，1944年達70%。參見：「侍從室第六組1940年度情報處理審核表」、「侍從室第六組1944年度情報處理審核表」，《侍從室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762，轉引自張瑞德，《無聲的要角》，頁85-86。

其材料多譯自敵國報章雜誌者」的評語。<sup>29</sup> 就侍六組管考資料而言，國研所蒐集情報較不具急要性、可執行性，而偏重研究性質，且普遍具有參考價值。

國研所作為對日作戰時期情報機構，在日本事務方面，對國府高層發揮如「智庫」般角色，應無庸置疑，然而，檢視各方檔案，王芃生主持國研所，所從事活動及其對戰時外交發揮之作用與影響，卻遠遠不僅止於此。王處事積極活躍，經常脫離國研所原有定位，又因工作性質隱密，往往僅限所內少數人員參與或知悉。下文將就戰爭與國際情勢演變，依對日作戰前期、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太平洋戰爭時期各階段逐一探討。

### 參、對日作戰前期西南國際戰略通道情蒐與交涉

上述王芃生於七七事變前夕上呈蔣中正之秘要報告，現收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該報告指出：

日本內政既以大陸政策為中心，而謀準戰時編成之促進，則對外活動自亦以解決中國問題為中心。除更進一步秘密與德、義結盟以牽制英、俄、法，籠絡美國以防止在太平洋與英合作或與俄接近……而目前主要目的，向英國求得大陸上之分贓妥協，以決定對中國要求之程度及進展之方式。<sup>30</sup>

王芃生進一步指稱，日本誘迫英國妥協並離間英國對俄、對中關係，交換條件為尊重英國在華北貿易及華南之地位，而日本在西亞、南亞等英國勢力範圍內所從事擾亂陰謀，則為其最後要脅。王芃生進一步研判，近來閩、浙、汕頭海岸屢次發現行蹤可疑之船、機闖入偵察，自去秋以來日本陸戰隊集中措置於臺灣，臺灣軍司令官5月赴東京密商，種種跡象顯示，日軍已預備於俟機進攻華北時，牽制華南以威脅國府。此外，日本長期為尋求南方據點考量，覬覦福建，以懷柔和平方式促成福建

<sup>29</sup> 〈侍從室第六組各機關報告處理審核表〉，《侍從室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762，轉引自張瑞德，《無聲的要角》，頁86-87。

<sup>30</sup> 「王芃生呈秘要報告」（1937年5月15日），〈日本對華軍事外交情報（五）〉，《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001-066201-00006-000。

地位之特殊化，獨占當地鐵路建設，排除該省中央勢力控制與他國侵入。尤其垂涎建設臺閩航空路線，與上海福岡航路相呼應，達成控制中國東南沿海領空目的。

隨著七七事變後戰火蔓延，日本海軍旋即宣布封鎖中國沿海各口岸。王芃生向蔣中正力陳東南沿海封鎖在即，必須設法開闢西南國際戰略通道，遂奉蔣命以交通部次長名義，秘密前往勘察布置。<sup>31</sup> 將國府檔案與時人回憶錄交相對照，可知王芃生於對日作戰前期往來中南半島等地，偵查敵情與國際運輸實況，與法屬印度支那督府、英屬緬甸督府及泰國軍政府等要人建立關係，穿梭中國駐外使館、邊省地方政府之間，即時對國府中央提供國際與地方情報、對策，並實際進行與各地方當局的協調、交涉工作。以下依地區及時序，就假道越南交涉、新加坡與泰國布局、滇緬公路開放策動三方面分陳。

## 一、假道越南交涉

1937年8月，國府為尋求假道越南運輸軍火，由特使孔祥熙、駐法大使顧維鈞等人積極向法國朝野交涉。隨著8月下旬「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定後，更有大批到來之俄援軍火，亟待由越起運入華。10月，法國內閣有禁止越南轉運軍火，免遭日軍轟炸之議。實則法國受限於在越實力，考量援華將損及其遠東利益，只能觀望局勢而游移未決，中方在巴黎的交涉陷入膠著。<sup>32</sup> 與此同時，王芃生自越南致電蔣中正，除呈報與越督柏里維埃 (Jules Brévié) 約談，轉達法方表面必須保持中立，但對華抗日頗感同情、願暗中通融，與中方增進合作；王芃生復以越南幾乎為當前唯一對外通路，而法國助華猶較英國堅決，應當妥善聯絡，建請中央特授法越高層勳章，以蔣氏夫妻名義捐款賑濟越南當地水患等親善表示。<sup>33</sup> 在獲悉巴黎閣議不利結果後，王芃生與廣州市市長兼西南運輸處處長曾養甫聯名呈蔣，主張應與法國政府達成切實諒解，互示保障兩國東亞權益，並承諾展築入桂鐵路等實際利益，而以

<sup>31</sup> 依據 1937 年 8 月行政院第 325 次會議決議：「交通部常務次長彭學沛調任政務次長。任命王芃生為交通部常務次長。」參見「蔣中正致國民政府文官處函」(1937 年 8 月 18 日)，〈交通部官員任免(二)〉，《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001-032170-00002-022。王芃生任交通部常務次長至次年 1 月 6 日被調職為止。

<sup>32</sup> 許文堂，〈第二次大戰時期中、日、法在越南的衝突與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4 期 (2004)，頁 63-69。

<sup>33</sup> 「王芃生電蔣中正」(1937 年 10 月 20 日、22 日)，〈對英法德義關係(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90103-00014-129、002-090103-00014-127。

供應中方軍火及運輸軍械經越為暗中交換條件。<sup>34</sup>

12月，王芃生在越連番訪晤後，與法越督府達成若干可由越運械的秘密協議條件：1. 軍械來源：莫購德、義品，且德貨有「凡爾賽和約」禁條，而法械容易辨認，英、美貨亦較易商量；2. 地方與非軍用名義：軍械表面作滇、桂所購，能作他用者，莫用軍用品名義。如為警察通用品，則以省警、路警、礦警用名義，密囑滇、桂省府向法越督府交涉，則屬地方對地方性質，在越督權限內較易通融；3. 滇緬臨時航運：經與雲南省主席龍雲、甫遷校至昆明之中央航空學校校長陳慶雲密商，在滇緬公路通車前，先於芒市至瑞麗公路旁急造大飛機場及臨時機庫，派兵守護，並將所購飛機經越運入，由仰光直運機場，同時由航校派員飛往配裝駕運，以應急需，如此可不待公路完成，即開始滇緬軍運。<sup>35</sup>

在軍械運輸上給予應變通融之外，法越當局以日軍侵略威脅孔急，亦感中越唇齒相依，聯防保安合作迫切。對於國府中央過去採孤立政策，未能及早注意西南交通及國境安全，復以中法越南商約談判費時五、六載，緩不濟急，頗多抱怨。法越要人故而向王芃生懇懇，由雙方地方政府速商國境交通及經濟合作，然後各呈政府批准施行，避免由兩中央經一般外交程序商議，曠日耗時。王芃生則認為法越民心不妨乘機利用，進一步向蔣中正建言請訂中法國境保安新約：其局部交通經濟合作，可由中央密派精通外文要員，協助滇、桂要員與越方共組小委員會，就地商議。其不須訂約者，以共營之商業組織行之；其應訂約款者，經雙方中央核准後作為附約，均暫不對外公開發表，只須在合作方式及條文上預防流弊，其權仍在中央。<sup>36</sup> 1938年1月，外交部經奉蔣指示，由駐河內總領事許念曾（1893-1965）就中越地方聯防提議進行試探並表示意見，大致同意王芃生的看法：1. 一切合作以雙方互利之經濟合作為中心，方有實際作用；2. 倘若由中央與法政府談判，法方或有所顧忌，不若由地方當局以保安名義進行談判為佳；3. 運輸問題與對日作戰前途關係繁重，倘於此時一面由邊省當局出面談判，則對當前運輸不無裨益，且雙方談判時，更可望獲

<sup>34</sup> 「曾養甫、王芃生電蔣中正」（1937年10月30日），〈對英法德義關係（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90103-00014-114。

<sup>35</sup> 「王芃生電蔣中正」（1937年12月27日），〈對英法德義關係（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90103-00014-126。

<sup>36</sup> 「王芃生電蔣中正」（1937年12月27日），〈對英法德義關係（四）〉，《蔣中正總統文物》。

得法越通融及便利。<sup>37</sup>

在越交涉期間，王芃生以越南既為當前我方運輸唯一要道，為進行便利，宜從聯絡感情、敦篤邦交入手。依王芃生觀察，法國人頗重榮譽，對於外國勳章向來欣羨，頒給殊榮實為聯絡、懷柔之最好方法。此前國府中央已有頒給越南各級官員采玉勳章一批的前例，所獲效果頗佳。王以國府慣例，頒給外人勳章向於國慶日或元旦發表，並須由駐外使領館呈請外交部核轉，然而此際軍事迫促，依正常程序恐周折耗時，不得已商同許念曾擬具名單與勳章等級，函呈蔣中正轉請國府密予授勳。該名單涵蓋法屬越南政界、軍界、運輸、商務等各方重要人士共 39 名，包括越督、法國駐越集團軍總司令、駐越空軍指揮、越南國營鐵路管理局局長、滇越鐵路公司總經理、河內商會會長等。<sup>38</sup> 經河內領事館數度去函外交部催詢，外部先以當年元旦暫不頒給友邦人員勳章婉拒，領事館則電復以此事既係王芃生所主動、名單上部分人士已先得允諾，恐傷外人感情，再度催請，至 1 月下旬蔣中正交外部核議名單並簽呈行政院轉請國府頒給，並囑不必在公報或報紙發表，7 月始由外部寄發。<sup>39</sup>

1939 年 1 月，歷經數月交涉，法方始允諾國府在越境代運、協助訂購軍火、派遣軍事顧問來華等各節。3 月，王芃生自河內呈報，前越督、現任越京法民代表范連納 (René Robin) 出示法國外長柏內 (Georges Bonnet) 復函，言及范氏所指昆明新設各工廠所用發動機由越轉運時被留難事，業經各關係機關精密研究後獲得解決，當可如范氏所願給予中國當局以較大便利，殖民部長並依外部意見，訓令越督查照。<sup>40</sup> 4 月，王芃生自海防急電中央，指海防當地現為軍運重鎮，近因車輛不敷使用，中方軍需來貨堆積甚多，關口一帶觸目皆是，危險堪虞，外人觀狀均大為驚訝，請令有關單位增速運輸。<sup>41</sup> 無論是中方貨品轉運遭到留難或堆積滯留海防，似

<sup>37</sup> 「許念曾電外交部」(1938 年 1 月 8 日)，〈關於滇緬及滇川湘各鐵路修築事〉，《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020-011110-0024。

<sup>38</sup> 「王芃生致蔣中正函」(1937 年)，〈頒贈法國人士采玉勳章(二)〉，《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020-101800-0078。

<sup>39</sup> 「河內總領事館致外交部函電」(1937 年 12 月 31 日；1938 年 1 月 5、19、29 日，10 月 6 日)，〈頒贈法國人士采玉勳章(二)〉，《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020-101800-0078、「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致外交部函」(1938 年 1 月 21 日)，〈頒贈法國人士采玉勳章(二)〉，《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020-101800-0078、「外交部致河內總領事館函電」(1938 年 1 月 4、21、31 日)，〈頒贈法國人士采玉勳章(二)〉，《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020-101800-0078。

<sup>40</sup> 「王芃生致蔣中正函」(1939 年 3 月 10 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80200-00522-008。

<sup>41</sup> 「王芃生致蔣中正電」(1939 年 4 月 29 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五)〉，《蔣中正總統文物》，

可能與法越督府受日軍攻占廣州及南沙島嶼所震懾，故而刻意緊縮軍用物資過境越南數量所致。<sup>42</sup>

然而中法緩和情勢僅僅維持數月。隨著歐戰爆發，法國對日妥協益形迫切。1940年6月中旬，德軍攻陷巴黎，維琪政府宣告成立，依附軸心陣營，在日本壓迫下，越督宣布封閉中越交通。對此變局，蔣中正除電令使館向德、蘇、美分別提出要求干涉，並指派王芃生擬定告日本國民書，再赴越南前線偵查。<sup>43</sup>然而，9月日軍進駐海防，借用越南北部空軍基地，10月日軍司令部移設河內，國府對外桂越、滇越線隨之相繼被切斷，滇緬公路遂成為西南大後方唯一之國際交通命脈。

## 二、新加坡與泰國布局

1937年12月王芃生在越南活動之後的行蹤，依據時任雲南省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繆雲台（1894-1988）回憶，同月為赴仰光與英緬政府商談滇緬公路建設，途經河內與越督洽商滇越鐵路運輸問題，而與王芃生相遇，並應其請提供掩護，王與幾位同事遂假扮繆隨員，先同車由河內至西貢，再同船經新加坡、檳榔嶼至仰光，又同車北上滇緬邊界勘查公路地形，至繆離開仰光時始分手，對照檔案所見王芃生行跡，大致相符。<sup>44</sup>1937年12月、1938年2月，王芃生曾二度停留新加坡安排軍運事務，期間除委請駐新加坡總領事館協助及介紹當地英國政府人員會談，並安排情報人員聯絡英國駐泰使領及武官等，規劃布建泰國情報網絡。循上述建請贈勳法越人士前例，王芃生再去電蔣中正擬請授勳軍運通路各友邦要員，包括英屬香港、新加坡、緬甸各總督，另葡屬澳門總督亦應懷柔，以免作祟。<sup>45</sup>駐星總領事高凌百經王芃生面告已奉蔣核准辦理，並受託向督府探詢名單人士勳位以備呈報，未料總督

國史館藏，002-080200-00522-021。

<sup>42</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譯，《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三分冊，頁294-295。

<sup>43</sup> 《蔣中正日記》，1940年6月18、23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2006C37，Box 40，Folder 22。

<sup>44</sup> 據繆雲台所言，僅知王芃生負有秘密使命，在東南亞安排抗日工作，從未詢問其工作詳情。繆雲台，雲南昆明人，官費留美回國後入雲南省政府，協助整頓礦務、金融、實業，後擔任資源委員會委員、行政院政務委員等職。1937年底繆雲台赴緬行，係其時雲南省府主動承擔滇緬公路修築工作，經英國駐昆明總領事安排，由英國駐緬秘書團團長正式邀請前往洽商，並議定以一年為期，各自將公路修築至邊界銜接。繆雲台，《繆雲台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頁99-102。

<sup>45</sup> 「王芃生電蔣中正」（1938年），〈對英法德義關係（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90103-00012-206；「王芃生電蔣中正」（1938年2月20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八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80200-00510-021。

秘書卻回覆以英國官吏除對授勳國家有特殊勳勞，及奉英皇核准外，不能接受外國勳章，婉辭卻謝，以軍運為目的之對英頒勳外交策略只能作罷。<sup>46</sup>

1938年1月，王芃生向蔣呈報日本誘脅泰國加入防共協定，或另訂日泰軍事合作條件，建請指派與泰國政府熟識的僑領蕭佛成為專使，縱然不能阻擋大勢所趨，尚可觀察動靜。經國防會議常務委員會議決議，交外交部密詢蕭氏意見。<sup>47</sup>按泰國自1930年代初期憲政革命成功後，皇族失勢，代以軍人合組之攝政委員會執政，崇尚軍國主義。為脫離西側英國、東側法國殖民政府威脅，並欲藉日本援助，收復泰國在王政時期被英、法割據之失土，每年不惜以鉅款增加海陸軍備，日泰邦交日益緊密，排華愈演愈烈。蕭佛成（1862-1940），祖籍福建，早年與孫中山交遊，建立同盟會暹羅分會，歷任國民黨暹羅總支部長、中央政治會議政治委員、中央海外部委員、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黨政資歷豐富。1936年兩廣事變後離廣州赴香港，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返回曼谷定居。

蕭佛成回報外長王寵惠時表示，泰日表面交好，然而現任國府主席、國防部長、外交部長均私下向其表明泰國親日無異引狼入室，僅為外交手腕不得不應付。泰國與日本有聯合防共趨勢，肇因於泰國自軍方掌權後，所定法律多有排華作用，其「懲辦共產黨專律」亦為防範中國共產黨而設。此際法西斯主義橫行，蘇聯援華，而英、美、法對日步步退讓，泰國欲加入防共協定以求自保，實為意料中事。蕭氏以自身為僑居身分，不宜擔任專使，建請選擇一外交能員，利用此地春節節慶歡迎外賓時來訪。<sup>48</sup>經蔣中正裁示，由外交部迅速遴派外交專員前往。王芃生則於2月下旬親赴曼谷偵察，與泰國外長及駐泰英、法公使密談，並向蔣呈報該等人士確實非親日派，僅敷衍兩位公使，允許秘密交換情報。<sup>49</sup>

國研所在泰國的長期情報工作，得到外交當局重視。1940年1月，國府鑒於

<sup>46</sup> 「新加坡總領事館呈外交部」（1938年3月8日），〈頒贈法國人士采玉勳章（一）〉，《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020-101800-0078。

<sup>47</sup> 「國防最高會議秘書處致外交部代電」（1938年4月15日），〈中泰商務協定〉，《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020-010404-0004。

<sup>48</sup> 「蕭佛成致王寵惠函」（1938年2月26日），〈中泰商務協定〉，《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020-010404-0004。

<sup>49</sup> 「王芃生電蔣中正」（1938年3月4日），〈對英法德義關係（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90103-00014-151。

中泰情形日趨複雜，為使各主管機關交換意見、齊一步驟及迅赴事機，成立跨部會機制，由外交部召集「中暹問題討論會」（後改稱「中泰問題討論會」），國民黨中央海外部、行政院僑務委員會派員出席，同年秋為擴大討論範圍，國研所與軍令部自 10 月起受邀加入，國研所由負責國際事務之第二組組長袁孟超代表出席，就泰國情勢與國際戰局發展，提供情報與戰略建言。<sup>50</sup>

### 三、滇緬公路開放策動

滇緬公路雲南段 1938 年 7 月初步通車，1938 年底、1939 年初全線通車以來，武器彈藥等物資得由緬甸仰光港經緬甸鐵路抵達臘戍，轉經滇緬公路進入昆明，使滇緬公路迅速成為國府仰賴外援軍需補給的主要國際交通命脈，也是日軍亟欲斷絕的首要戰略目標，緬甸同時因之為世人所注目。<sup>51</sup> 然而英國受歐戰情勢惡化與日本所迫，1940 年 1 月起禁止香港至中國內陸軍火輸出，7 月宣布暫時封閉緬甸路線 3 個月，美國隨即發表聲明表示反對。10 月上旬，英國以日本未能於期限內達成遠東和平之解決，首相邱吉爾於國會親自宣布重開緬甸路線。

與此同時，王芃生致函外交部，對於英方雖已決定開放滇緬公路，但開放後日軍必將進行轟炸或進占，而英緬卻尚未相應作出軍事準備，提出警告。王芃生進一步指出，滇緬路將來是否復封，當視美國態度與英國國力而定，建請外交部力勸英國敦促美國保路。此外，王芃生根據國研所駐緬人員報稱，仰光緬中文化協會、華僑救災總會、華商商會等團體為策動開放滇緬路，曾發起開路運動，並於 10 月上旬起舉行開路運動週活動，聯合中、英、緬文化教育及宗教團體名人等發動國民外交，向英緬當局呼籲開路。<sup>52</sup> 國研所編輯之報告「全緬中外人士對開路之策動與倭之阻撓」，指出自緬甸國防部接倫敦開放滇緬路訓令，進行研究開路問題後，緬方及中方人士均有所布置。國研所則以重慶作家協會、新聞記者協會等名義，致函全緬作家協會主席宇巴崔及全緬記者協會，請援助中國開放滇緬路。緬中文化協會除

<sup>50</sup> 「外交部致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函」（1940 年 10 月 27 日），〈中泰問題討論會（二）〉，《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020-010402-0004。該會舉行至 1943 年夏為止。

<sup>51</sup> 有關滇緬公路路政發展，參見李君山，〈抗戰時期西南運輸的發展與困境——以滇緬公路為中心的探討（1938-1942）〉，吳淑鳳等編，《不可忽視的戰場》，頁 109-142。

<sup>52</sup> 「王芃生致蔣中正函」（1940 年 10 月 11 日），〈滇緬運輸——日軍的破壞與威脅（二）〉，《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020-011110-0008。

以間接方式策動有關政治部門，並由委員宇敦生運作在仰光緬僧集會通過議案，以中緬文協寄來之代電附宣言，請各報刊載。旅緬僑界對開路運動亦策劃甚力，同時在華、英、緬、印文各報發表宣傳言論。王芃生並請外交部轉知國內文化界與有關國民外交團體去電響應，藉表贊助，以利對日作戰。

## 肆、中英宣傳與情報合作開展

自 1940 年年中日本陸軍制定南方作戰計畫，9 月進駐越南以後，東南亞已成為日本與歐美、尤其是英國勢力作戰的主戰場，緬甸則被視為斷絕中國抗日生命線的地理要衝，以及東南亞主要戰略地區外側的防衛反擊區。1941 年 2 月「南機關」於曼谷成立，推動「解放東亞」、策動緬甸獨立運動為武裝暴動的政治工作，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作為日軍對緬戰略核心，11 月日軍大本營會議通過「促進對中、美、英、荷戰爭早日結束之腹案」，決定以「促進緬甸獨立，並利用其成果刺激印度獨立」作為迫使英國屈服的手段。<sup>53</sup> 此後日本在東南亞各地宣傳反西方帝國殖民，在印度與抗英獨立運動合流，鼓動印度流亡民族主義者倒向與軸心國結盟，也成為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中、美、英正式結為同盟關係後，面對印、緬所亟待處理的一項課題。而王芃生也在對日情報研析以及與法越、英緬、邊省當局交涉國際運輸事務之外，展開反日策動與宣傳工作，與英方發展出進一步的合作關係。

### 一、對緬印之反日策動與宣傳

1941 年 12 月至翌年 1 月間，日軍在太平洋區內迅速擴張，星馬岌岌可危，日軍對緬戰略急速升級。自中、英簽訂「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成為軍事同盟，1 月上旬，蔣中正以此時為訪印、緬時機，經英方表示歡迎後於 2 月初成行。蔣自道訪印目的，在「勸英印互諒互讓、勸印多出兵出力」，調解英印殖民宗主國與殖民地社會之間的政治矛盾，力促英印雙方接受印度進入自治領體制階段，消弭印度反戰

<sup>53</sup> 齋藤照子，〈二戰時期日軍對緬工作機構——南機關再考〉，《南洋資料譯叢》，第 2 期（2009），頁 49-56。

情緒，使共同對抗法西斯侵略為主。<sup>54</sup> 蔣於訪問印、緬期間，與兩總督府官員就軍事、交通、經濟合作廣泛商談之外，包括緬甸總督史密斯 (Reginald Dorman Smith) 等人皆向蔣一再強調日本對印、緬政治活動與宣傳戰術問題，影響印、緬人心對日作戰意識。為促使中方與英印、英緬建立實質關係，蔣同意前英國駐華大使卡爾 (Archibald Clark Kerr) 及緬督所請，中方與印、緬互派半外交性質代表常駐；蔣並允諾考慮卡爾所建議設置中、英、美聯合對日宣傳機構，可請王芃生主持，另同意緬督要求從重慶派若干情報員組織華僑，協助取締日本第五縱隊在緬活動。<sup>55</sup>

此時日軍已展開對緬攻勢，摩爾門陷落，仰光告急，滇緬路岌岌可危，國府組建遠征軍迅速從雲南向緬甸進發。就在遠征軍開拔進程中，3月8日仰光陷落，滇緬路對外門戶已封閉。蔣中正電令第五軍入緬部隊暫緩，在認識英軍決心與實力有限下，考慮放棄協助英軍收復仰光，改以緬北首都曼德勒為中心進行防禦戰，與剛到任的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全面反攻戰略產生分歧。然而蔣中正終究作出讓步，同意尊重史迪威的指揮權，與美、英盟軍維持和諧關係。與此同時，蔣中正致函緬督史密斯，指值此中緬兩方密切合作以抗日之時，為增進雙方軍民之團結與聯繫，以王芃生兼具政治及軍事經驗，對於中、英、緬、印之合作意義，尤有深切理解，且精悉敵國日本情形及敵人侵略之積惡暴行，特派王芃生協助援緬軍將士與華僑團體等對英緬之聯絡合作及宣傳事宜，並與緬方文武人員交換意見，增進友誼，以達成對日作戰致勝之目的。

史密斯復蔣函稱王芃生幹練有為，最適宜擔任主持中緬合作，王芃生抵緬後與英緬督府各部長已做詳盡商討，緬甸總理保頓 (Paw Tun) 即將攜同少數精選緬人，前往臘戍，與王芃生就其所提議組設之機構進行合作，使反日宣傳獲得新開展。<sup>56</sup> 王芃生於呈報蔣與緬督商定時則指出，英緬方面同意組織民眾及憲警合作，但主張需適應各地情形需要，雙方結論有四：1. 在臘戍設反侵略戰爭協會；2. 將原有緬

<sup>54</sup> 蔣自述：「訪印目的：甲、勸英印互讓合作；乙、勸印多出兵出力；丙、勸英允許印自治；丁、為將來中印合作基礎；戊、宣傳三民主義。」《蔣中正日記》，1942年1月8日、30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2006C37，Box 42，Folder 6。

<sup>55</sup> 「蔣中正與卡爾會談紀錄」(1942年2月15日)，〈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蔣委員長訪印(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20300-00021-008、002-020300-00021-052。

<sup>56</sup> 「蔣中正致史密斯函」(1942年3月17日)、「史密斯復蔣中正函」(1942年3月27日)，〈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20300-00019-025。

中文化協會擴大移設曼德勒以北之麥苗；3. 在曼德勒密組中緬憲警合作機關偵緝奸細，保護滇緬路交通安全；4. 在淪陷區及泰國加強情報合作。在英緬總理等官員參與支持下，王芃生向蔣力陳建請軍統局書記長兼軍令部第二廳副廳長鄭介民速來共同主持緬、印工作事宜。<sup>57</sup> 英方於情勢危急中，如駐緬陸軍總司令亞歷山大(Harold Alexander)、英國特勤處遠東及駐緬負責人等，甚且向王芃生表示得宣傳英方願於戰後許諾印、緬自由及其他合作，並力勸王芃生赴印遊說國大黨人，英緬總理復委請王於抵印後，邀請此時於新德里交涉印度戰後自治的英國特使克利普斯(Stafford Cripps) 來緬一行，以免日方挑撥誣指英國重印輕緬。<sup>58</sup>

與此同時，戴笠奉蔣批示與王芃生合作對緬工作，派親信毛人鳳與王面議，並介紹華僑卓獻書與談。<sup>59</sup> 此前王芃生亦向英方薦介，為徵募華僑特工之合宜人選，應與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及中統接洽，可見王與軍統、中統互有聯繫。<sup>60</sup> 然而未幾，曼德勒陷落，盟軍在第一次緬甸戰役最終以慘敗收場，艱辛跋涉退入印度；軍統局則呈蔣獲允組織泰國別動軍挺進隊，由卓獻書指揮設於中緬邊境之「暹羅軍事專員公署」，號召泰國華僑，蒐集兵要情報。<sup>61</sup> 就在4月上旬緬戰期間，王芃生接獲蔣指示，同意了英方所請，就對日策動反戰與情報事宜，由王芃生主持與英方之合作。

## 二、與英國特勤處建立合作關係

如前言所述，有關英方在國研所派駐合作單位，學界研究仍相當有限。《特勤處檔案》所收入一件機密報告，詳細記述了國研所與特勤處成立臨時合作單位「資源調查所」(Resources Investigation Institute, RII，以下簡稱資源所)的成立經過。<sup>62</sup> 根據英方認識，王芃生主持國研所直接聽命於蔣，以蒐集日本與日本占領區情報

<sup>57</sup> 「王芃生電蔣中正」(1942年3月26日)，〈遠征入緬(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90105-00007-323。

<sup>58</sup> 「王芃生電蔣中正」(1942年3月3日)，〈盟軍聯合作戰(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80103-00063-013。

<sup>59</sup> 「戴笠電毛人鳳」(1942年3月16日)、「戴笠電毛人鳳轉王芃生」(1942年3月16日)，〈戴公遺墨——其他類(第4卷)〉，《戴笠史料》，國史館藏，144-010199-0004-069。

<sup>60</sup> “Chinese Agents and Operatives for Burma, Siam, Indo-China and Marine Agents Familiar with Gulf of Siam, South China Seas, etc.” (January 30, 1942), China general; guerrillas; Chungking general; proposals for formation of Sino-British resistance movement 1944, Records of SO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80.

<sup>61</sup> 「戴笠手令」(1942年4月30日)，〈戴公遺墨——組織類(第4卷)〉，《戴笠史料》，國史館藏，144-010105-0004-014。

<sup>62</sup> “RII Origin-Scope-Objectives” (1941), Research and Investment Institute (R.I.I.), Records of SO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59.

為主要工作，在敵占區設有無線電台及大批駐點情報員。英方評估，王芃生堪稱頭號敵情專家、也是蔣最信任的幕僚之一，因而在國府於敵占區進行顛覆或情蒐活動的諸多機構中，鎖定國研所為合作對象。

1941年年中，特勤處在華負責人安獻今 (G. Findlay Andrew, 1887-1971) 奉命以半外交官身分前赴重慶，推動對華情報交換與策動合作事宜，並與王芃生等人接觸。<sup>63</sup> 安獻今生於貴州，為基督教中國內地會傳教士，曾供職於英資太古洋行，集傳教員、冒險家、情報員、外交官等多重身分於一身。<sup>64</sup> 安獻今先以英國駐華大使館新聞專員職位作為掩護，後升任一等秘書、參事，1944年冬卸職離華。特勤處另委派代表凱瑟克 (John H. Keswick, 1906-1982) 充大使館一等秘書銜經濟作戰顧問，指導安獻今活動，後升任參事，1943年轉赴錫蘭任職於東南亞盟軍司令部。<sup>65</sup> 凱瑟克繼承父業，成年未幾即出任遠東最大英資財團怡和洋行大班，在香港、上海政商界人脈深厚。凱瑟克、安獻今之受特勤處委任，顯示了英國在華情報活動與商貿利益密切連結的特殊性質。<sup>66</sup>

安獻今會同王芃生所擬中英合作構想，規劃工作重點包括：1. 公然的反日宣傳工作（以掩護秘勤活動）；2. 在敵占區及敵國與盟軍情報合作；3. 在敵占區及敵國境內破壞活動；4. 扶植日本、朝鮮、臺灣愛國人士的革命行動。1941年12月16日，雙方擬定合作計畫草案，提議設置一「日本文化事務局」(Japanese Cultural Affairs Research Institute) 為執行機構，次日由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向蔣委員長呈遞對華合作備忘錄。該備忘錄並不包含特勤處與王芃生所擬工作細節，亦未提及王芃生的名字。

從合作計畫工作重點觀之，第1、3、4項與王芃生自1940年春汪兆銘政權於

<sup>63</sup> Richard J. 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 282; Bernard Wasserstein, *Secret War in Shanghai: An Untold Story of Espionage, Intrigue and Treason in World War II*, pp. 211-212.

<sup>64</sup> 安獻今長年於西北一帶傳教，一次大戰期間協助英國駐北京公使館蒐集當地情資，1930年代先後參與華洋義賑會、紅十字會，並主持太古洋行中國事務部門。Antony Best,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the Japanese Challenge in Asia, 1914-1941*, p. 9.

<sup>65</sup> 「英國大使館致外交部照會」(1941年12月22日、1942年1月7日)，〈英國駐華外交人員動態(一)〉，《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020-100400-0178；「英國大使館致外交部照會」(1944年10月30日)，〈英國駐華外交人員動態(三)〉，《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020-100400-0180。

<sup>66</sup> 戰時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在非淪陷區仍持續營運，與英美情報機構暗中合作，安獻今在大使館掛名，實領太古洋行薪俸。凱瑟克之兄 William J. "Tony" Keswick (1903-1990) 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出任特勤處倫敦總部遠東區主任，此前曾歷任怡和洋行大班、上海工部局總董。凱瑟克滯留重慶期間與周恩來頗有往來，戰後赴港，長期擔任中英貿易協會會長。參見 Bernard Wasserstein, *Secret War in Shanghai: An Untold Story of Espionage, Intrigue and Treason in World War II*, pp. 197-198, 213.

南京成立，奉蔣中正指示與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共同負責策動日、韓、臺各反戰及革命運動，以此類團體在重慶之革命首領為對象，暗中會商組織，若合符節。<sup>67</sup> 王芃生約於 1941 年春，曾上呈蔣中正「對倭策動說帖」，述及自從奉命承辦策動聯絡在重慶之日、韓、臺各反戰及革命組織，對於在中國內地、美國及日本之此類團體，已能大體明瞭或有路可尋，並掌握具體材料，供設計進行之參考。王芃生以對敵策動茲事體大，向蔣力陳：

非立確切不移之方針，明定因應擒縱之界線，並以深切理解之能員，予以便宜行事之專責，密商友邦（美、英或其一方）協同為之，則不易奏效。幸今日情形，英、美與我利害密切，較易商洽。縱不一切合作而得其默契諒解，予以協助便利，則事亦大有可為。而在我方則為打開僵持株守之悶局，免成內政經濟之比賽。務以政略助成戰略之目的，以策動促進敵之內潰。<sup>68</sup>

可見王芃生對於與英、美合作，早有積極主動之意。放眼日、蘇即將達成軍事中立協定，而西南國際運輸通道亦有隨時被切斷的可能性，王芃生向蔣力主進一步擴大對敵策動工作，深入日軍占領區、日本本土實地偵查，並動員海外策應；以對敵策動為政治攻勢武器，如能收效，不僅可以制敵，尚得以使國府保持獨立自主之立場，而不受英、美挾制。

至於英方尋求對華合作目的，依據上述特勤處報告，特勤處係奉倫敦高層指示，對華合作實際目標，有不能向中方明言而對英國遠東戰略具重大意義者：即協助中方持續作戰，並改善英國對華關係。因應卡爾 12 月中旬所請，蔣中正指派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世杰負責對英合作。在與王世杰、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的後續商談過程中，卡爾等人深感中宣部無法承辦特勤處原擬工作重點，雙方交涉僅限於第一點公開的反日宣傳事項。12 月底，卡爾在預先取得美國駐華大使高斯（Clarence E. Gauss）同意下，與王世杰商定於重慶設立中英美聯合宣傳機構；1 月初王世杰復與英使、美使、新任荷使會談後，決議定名為「反侵略國聯合宣傳委員會」，由王

<sup>67</sup> 「蔣中正寅陪侍秘渝電」（1940 年 3 月 30 日），〈特種情報——軍統（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80102-00039-021。

<sup>68</sup> 「王芃生呈蔣中正對倭策動說帖」（1941 年），〈特種情報——軍統（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80102-00039-021。

擔任主席，各該使館派員參加。<sup>69</sup>

1942年2月中旬，已行將就任英國駐蘇聯大使的卡爾於印度新德里再就對日情報策動合作事向蔣爭取。卡爾以1月於重慶成立之聯合宣傳委員會由中宣部長王世杰主持，然而對敵宣傳需用不同方法，有時表面上似乎事涉卑陋，恐非王部長所宜，建議由對於這類秘密宣傳頗具經驗的王芃生主持。<sup>70</sup>3月下旬，英方再透過王芃生表達與英緬督府之情報與反日宣傳合作，其相關辦報活動及經費，盼作為前呈中英合作計畫的一部分，在緬甸先樹立規模。<sup>71</sup>4月上旬，蔣終於拍板定案，准王芃生就對日策動事，與英方合作，不必用龐大名義、不另設組織，取消對日文化事務局名義，王芃生於面陳蔣後奉准可就國研所內設一顧問室辦理（Advisors' Office），英國特勤處則以「資源調查所」代號為名。<sup>72</sup>

國研所顧問室由英方提供硬體設備、技術支援、情報人員工作費用等財務支援，換取中方所得秘密情報與調查資訊，惟所有提供英方之情報內容均先經王芃生核閱，內容自國研所第一、二組所編「情報摘要」、「研究報告」等篩選，價值相對有限。<sup>73</sup>顧問室設二處、會計室及專用電台，聘英籍顧問安獻今及 J. A. T. Galvin 二位，所、室刻意分隔二地，非相關人員互不往來。所方另用英人所贈石印與鉛印機，成立一印刷廠，自印或代其他單位印刷宣傳資料。<sup>74</sup>英人以資源所為掩護，外勤人員所從事情蒐、對敵宣傳、建立無線電通訊網絡等工作，在中國境內初期分三區進行，包括以上海為中心之沿海地區、北方敵占區及敵偽組織、香港為主要據點之南方各省，後擴展至越南、緬甸等（如圖一）。<sup>75</sup>

<sup>69</sup> 林美莉編，《王世杰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上冊，頁402、404。

<sup>70</sup> 「蔣中正與卡爾會談紀錄」（1942年2月15日），〈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蔣委員長訪印（一）〉，《蔣中正總統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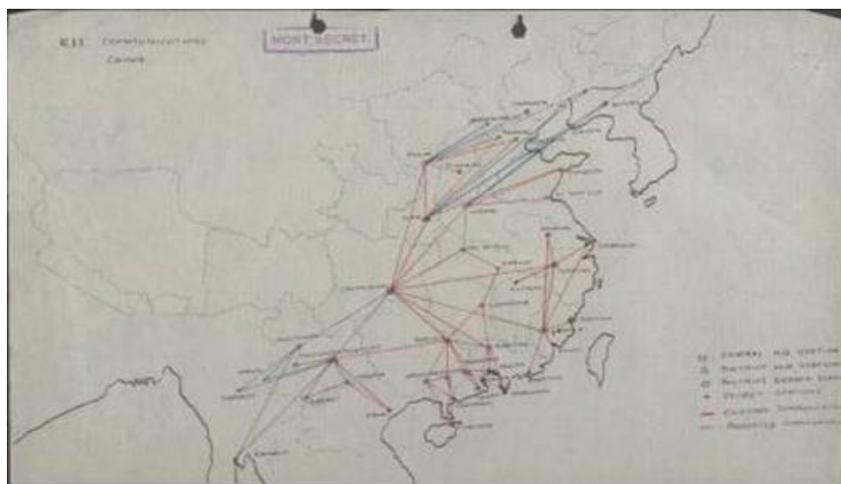
<sup>71</sup> 「王芃生電蔣中正」（1942年3月26日），〈遠征入緬（二）〉，《蔣中正總統文物》。

<sup>72</sup> 「王芃生復蔣中正函」（1943年8月17日），〈特種情報——軍統（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80102-00039-024。

<sup>73</sup> 報告收入 Chinese Intelligence Reports, No. 1-103 (1942-1945), Records of SO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41-144.

<sup>74</sup> J. A. T. Galvin 於英國大使館並無正式職位。Charles Cruickshank, *SOE in the Far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51.

<sup>75</sup> “RII Communications China” (October 15, 1942), Research and Investment Institute (R.I.I.); Koreans; D.O.s,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40; Charles Cruickshank, *SOE in the Far East*, p. 152.



【圖一】資源調查所 (RII) 中國情報通訊站網絡規劃

說明：資源所規劃中國情報通訊網絡，涵蓋東北至華南沿海、華北至西南內陸，並延伸至朝鮮半島安東、中南半島越南河內等地，遠至緬甸仰光。

圖片來源：“RII Communications China” (October 15, 1942), Research and Investment Institute (R.I.I.); Koreans; D.O.s,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40.

與特勤處進行宣傳與情報合作外，從英國外交部檔案觀之，王芃生也成為英國外交系統藉以掌握國府對外政策趨向的重要管道之一。英國駐華大使薛穆 (Horace J. Seymour) 於 1942 年 7 月報告倫敦外交部，王芃生向安獻今指出，國研所已奉蔣中正指示規劃戰後處置重要問題相關事宜，包括香港與上海的未來地位。王的觀點是，香港應歸還中國，但以合作治理基礎，維持英國利益；上海則必須由中國統治，但將賦予特殊地位發展港市，持續開放國際協商的意願以及與外資合作的前景。<sup>76</sup> 英國外交部與薛穆則明確指示安獻今與王芃生進一步非正式討論，取得王的信任。事實上，薛穆曾肯定與王芃生接觸，對探究國府理念能取得「明顯優勢」(distinct advantages)。<sup>77</sup> 英國外交部同年 9 月由遠東司 (Far Eastern Department) 司長克拉克

<sup>76</sup> “Seymour to Foreign Office” (July 15, 1942), Extraterritoriality in Free China - Appointment of Judg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FO 371/31658.

<sup>77</sup> “G. E. Gent (Colonial Office) to Ashley Clarke” (July 24, 1942), Post-war Settlement in the Far East,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FO 371/31715. 值得一提的是，王芃生的反日宣傳工作，包括對日廣播、中緬文化協會活動等，亦曾引起日本情報系統關注。「売国日本人、重慶より反日放送」(1941 年 11 月 28 日)，〈各種情報資料・外国宣伝情報〉，《內閣・總理府文書》，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情 00055100-085；「中緬文化協會副會長印度へ」(1942 年 10 月 7 日)，〈重慶側資料第 91 号「文化」日文資料(文化団体)昭和 17 年迄〉，《陸軍一般史料》，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支那-參考資料-83。

(Ashley Clarke) 所擬、向美國國務院提交的備忘錄提到，治外法權撤廢後尋求上海特殊地位，係王芃生與「一位英國大使館官員」非正式談話時所提議。<sup>78</sup> 1943年夏克拉克復依據情資，評估重慶政府所在大後方政經情勢和緩，蔣中正在戴笠、王芃生組織防衛下，領導地位穩固；<sup>79</sup> 1944年夏初克拉克與印度部 (India Office) 就各自觀察作出一致結論，認為國府欲全面掌控西藏已勢不可免，所根據駐華大使館參事台克滿 (Eric Teichman) 1943年報告，依克拉克之見，顯然受了王芃生相當影響。

80

## 伍、擴展國際合作面臨的內外困境

前述 1941年王芃生呈蔣中正說帖主張，爭取與美、英或其一之友邦，協同偵查並擴大動員對日策動反戰，從而累積國府戰時乃至戰後國際政治資本，以及安獻今、王芃生所共擬合作計畫涵蓋公開宣傳、盟軍情報合作、暗中破壞、扶植反日勢力等工作重點，對照 1942年春國研所與特勤處合作案止於中、英之間，合作項目及範圍亦大幅縮減成為英方以財力、設備挹注中方，中方提供敵情報以為交換，呈現相當落差。王芃生在與特勤處合作逾一年後，亦對蔣自道：「對敵工作，因英方重在先擊敗德，且為陰柔之國，故我方迄今不採積極態度。」<sup>81</sup> 顯然中、英雙方對該合作案態度均表現消極，成果有限。

王芃生領導國研所，在尋求外援與國際合作方面，向來展現主動作為，消長之間，所承受內外掣肘因素，頗值探討。蔣中正限縮國研所與英方合作案的決策，從

<sup>78</sup> 該官員應該就是安獻今，見“Foreign Office Minute by Ashley Clarke” (September 14, 1942), Extraterritoriality in Free China - Appointment of Judg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FO 371/31658。又美國駐英大使於次日致美國國務卿電文亦有轉述，“John Winant to Cordell Hull” (September 15, 194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p. 293.

<sup>79</sup> “Ashley Clarke to George Sansom” (August 13, 1943), Internal Situati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FO 371/35801.

<sup>80</sup> “Ashley Clarke to Geoffrey A. Wallinger” (June 6, 1944), Yatung News Reports and Other News Reports from Tibet,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FO 371/41586。克拉克函述及台克滿的報告日期為 1943年 6月 30日，指稱該報告「符合王芃生的利益」(for Wang Pun Son's benefit)。

<sup>81</sup> 「王芃生復蔣中正函」(1943年 8月 17日)，〈特種情報——軍統(六)〉，《蔣中正總統文物》。

長遠觀之，蔣長年以來對英人的強烈不信任與反帝國主義主張，以及英國政府在中日開戰後為維護遠東利益對日本多方妥協、極力避免對日作戰，對國府幾番爭取金錢援助與軍事合作提議漠視、延宕等態度，固然為此際雙方互動及合作推展蒙上深重陰影；中日戰爭以來國府情報工作組織龐雜，國研所面臨多重競爭與制衡，所內則人事糾葛不斷，而王芃生尋求合作的對象英、美情報機構，又各有盤算、相互牽制，皆造成直接影響。以下從三方面討論之。

### 一、國研所內部人事糾葛

王芃生早年在家鄉湖南參加辛亥革命，自東瀛返國最初跟隨湖南要人何鍵，其後轉入外交界嶄露頭角，與國民黨權力核心並無淵源；而國研所係抗戰時期的臨時性組織，王芃生創所本無基礎，初期用人多受制於其他情報機關，所內組成人員複雜，有來自軍統局、中統局者，也有王的鄉親故舊、臺籍抗日人士、日籍反戰人士等，對有共黨背景人士亦吸納為所本部主管，如據舊部袁孟超所言，國研所外勤站中共地下黨員尤眾。<sup>82</sup> 舊部回憶，王芃生以個人權威、情報專業領導國研所，集極右派至左傾者於一爐，五方雜處，王又不善行政管理，致內部矛盾深化，王的政黨傾向，也再三遭到質疑。按王芃生於 1913、1927 年兩度加入國民黨，著述屢屢強調三民主義與對黨的忠誠，刻意表明心志，於戰後對日處置，則主張寬容以防範日本赤化，似難以思想傾共論斷；王與共黨或左傾人士廣泛交遊，卻亦屬實。如侍從室人事評語所稱「氣度開闊，豁達不羈」，「惟馭下寬縱，賞罰嘗欠分明，關於事務處理及組織才幹亦非所長」，可謂中肯之見。<sup>83</sup>

國研所內部對王芃生批判最力者，前有主任秘書龔德柏（1891-1980），曾向侍從室告發王與中共黨員來往密切，1940 年下半年已離職；<sup>84</sup> 後有顧問室第二處處

<sup>82</sup> 袁孟超，〈緬懷愛國主義戰士日本問題權威王芃生和國際問題研究所〉、郭福生，〈我所知道的王芃生及國際問題研究所〉，收入陳爾靖編，《王芃生與臺灣抗日志士》，頁 19-22、63-64。

<sup>83</sup> 「調查報告」（1943 年），〈王芃生〉，《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國史館藏，129000001718A；「解決中日問題之基本原則」，〈國際問題討論會第一到第六次會議紀錄〉，《國防檔案》，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防 005/0002.1。依據侍從室人事登記片，王芃生係於 1913 年 5 月、1927 年 2 月兩次加入國民黨，主要著作包括《三民主義國際問題研究法》、《一個平凡黨員的回憶與自我檢討》等。

<sup>84</sup> 龔德柏，《龔德柏回憶錄》（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下冊，頁 547-586。龔德柏，湖南瀘溪人，早年考取官費留日，於東京結識王芃生，後同任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隨員赴美，返國後曾創辦《大同晚報》、《救國晚報》等，歷任外交部特派湖南交涉員、內政部參事，1938-1940 年任國研所主任秘書，對王有人格偏差、對國研所管理不當、與周恩來經常密談等負評。當時在侍六組供職的張令澳，指龔德柏之說多係捕風捉影，侍從室認為龔所告不實，不予處理，而戴笠則利用王、龔等人矛盾，意圖打擊並整併國

長羅堅白，王、羅不睦，直接衝擊國研所與英方之合作。羅堅白（1900-?），湖南衡陽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畢，九一八事變後在張學良部下擔任諜報工作，先後於軍委會北平分會、武昌行營等任職。長英、日語，通曉日情。後因反共立場脫離張學良，1937年參加廬山訓練團入國民黨，同年進入國研所，派駐越南工作組組長，協助王芃生防範日諜在滇、桂、越、泰、緬活動，因成績卓著，蒙蔣中正傳令嘉獎。其後歷任國研所外事室主任、第三組（即圖書資料組）組長，1942年7月調職顧問室第二處，與英方合作對日調查研究。未料羅入顧問室一年後，1943年7月即密呈侍從室一份報告，題為「六年疑心暗鬼中」，控訴王芃生以陰謀家自命，國研所委用人員多共黨人士，遭共黨利用包攬對日情報工作，以及羅自進入國研所以來，不斷與所內共黨成員鬥爭，已深招共黨與王之忌恨。經侍從室調查了解後，王、羅兩人仍留任原職，羅於1944年復升任少將專門委員。<sup>85</sup>

然而，安獻今於6月底及隔年年初兩度向倫敦回報指出，與國研所的合作陷入膠著，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王芃生與羅堅白關係惡化，導致國研所工作停滯；尤有甚者，王芃生恐已失去蔣中正的信任，政治地位大跌。以安獻今這樣的外人觀察，蔣王關係之疏離冷淡十分顯著，在國府重要儀典及外交場合已不復見王出席。安獻今雖無法充分掌握箇中委委，據報應是在王芃生的手下狀況連連、觸怒層峰後，蔣對王在外交事務上的建言不再採信，從而嚴重影響雙方合作進展。<sup>86</sup> 王芃生與特勤處的互信基礎，也因英方數月來和美國情報機構「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以下簡稱戰略局）在華情報競爭，連帶受到影響。<sup>87</sup>

## 二、尋求與美方合作未果

1942年6月，為協調盟軍共同作戰，美國戰略局與英國特勤處達成各戰區基本合作協議，明定美國勢力範圍地區由戰略局掌控該區特勤事務，英國勢力範圍地區

---

研所。參見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臺北：周知文化公司，1995），頁101-103。

<sup>85</sup> 「人事登記片」（1944年），〈羅堅白〉，《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國史館藏，129000001725A。

<sup>86</sup> “Findlay Andrew (Chungking) to Operations Executive (London)” (February 16, 1944), Research and Investment Institute (R.I.I.); Koreans; D.O.s,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40.

<sup>87</sup> 戰略局為美國中央情報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前身，係羅斯福為強化美國戰時情報體系，指派鄧諾文參考英國特勤處等機構所規劃、籌組，1942年中正式成立，受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Joint Chiefs of Staff) 指揮監督，至1945年秋解散，所屬各組織於歐亞敵占區從事破壞、顛覆、反宣傳、訓練反抗軍等任務。

由特勤處掌控該區特勤事務。依據該協議，中國戰區既屬美國勢力範圍，美國在華具優先地位，戰略局應享主導權。<sup>88</sup> 按美中情報機構聯繫，始於珍珠港事變前夕，戴笠命令手下、時任駐美大使館副武官蕭勃與戰略局前身「情報協調局」(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 局長鄧諾文 (William J. Donovan) 洽談，尋求美國協助加強游擊隊訓練與裝備計畫未果；而美國海軍部 (Department of the Navy) 為取得日軍在太平洋西岸活動情報，與蕭勃結識，得蔣中正同意並指示由軍統局戴笠負責合作事宜，遂派梅樂斯 (Milton E. Miles) 於 1942 年 5 月來華會商協定，與中方共同視察中國沿海。<sup>89</sup>

1942 年 6 月，戰略局成立，鄧諾文出任局長；9 月，梅樂斯被鄧諾文突然委任為戰略局遠東地區協調主任，確認美方與軍統局戴笠的合作關係，加速討論協定細節。另一方面，英國特勤處以其時戰略局在華布建尚處起步階段為契機，刻意對戰略局隱瞞與國研所的合作關係，杜絕美方干預。特勤處此舉顯然亦得到蔣中正的支持，同意英方為國研所的單一合作對象。就特勤處高層觀察所得結論，蔣中正之不願美方參與國研所對英合作案，則是為了分隔英、美，便於操弄兩方。<sup>90</sup>

1943 年 4 月，中美情報合作具體成形，軍統局與美國海軍部、戰略局達成共識簽署協定，創建「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SACO)。<sup>91</sup> 軍統局與美方的合作關係，也為王芃生與國研所帶來不同以往的變局與挑戰。從美國駐華大使館對國務院的彙報顯示，過去美國駐華官員對王芃生的認識，主要將其視為蔣中正的對日事務顧問，對國府外交決策具有相當影響力；大使館秘書戴維斯 (John P. Davies, Jr.) 則引共方舉報指出，王芃生作為國府知日權威，然而其情報分析曾犯過幾次重大失誤。<sup>92</sup> 在軍統局主導中美合作後，王芃生則被美方視

<sup>88</sup> "Summary of Agreement between British SOE and American SO" (June 16-22, 1942), OSS/SOE Cooperati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65.

<sup>89</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編印，《中美合作所誌》(臺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2011)，頁 12-15。1941 年鄧諾文與中方之合作名稱為「黃龍計畫」(Dragon Plan)。

<sup>90</sup> Charles Cruickshank, *SOE in the Far East*, p. 152; Richard J. 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 283.

<sup>91</sup> 中美所依主要業務，於所本部下轄情報、作戰、氣象、偵譯、特警、通訊、秘密行動、研究分析、心理作戰等各組，另派員指揮別動軍作戰，並於沿海設立訓練基地、前進指揮所等，配合美軍登陸。戴笠自中美所創始即擔任主任至 1946 年春亡故，同年 7 月該所正式結束。

<sup>92</sup> "Memorandum by Davies to Stilwell" (July 14, 194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p. 210.

為戴笠的對手，其主持國研所情報工作，在多方面與軍統局形成競爭。<sup>93</sup>

著名中國近代史學者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的回憶錄為國研所與軍統局的競爭態勢，提供佐證。費正清於 1942 年秋以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文官身分抵達重慶，任職於美國大使館，同時為戰略局執行蒐集和微縮拍攝日本出版品的秘密任務。據費正清所言，王芃生是當時在重慶唯一持有日本方面資料的專家，相較之下，梅樂斯所掌握資料十分陳舊、瑣碎無用。費正清停留重慶至 1943 年 5 月前往昆明期間，經常偕同微縮底片實驗室主管與王芃生互相款宴，並得王同意，於國研所拍攝了大量日本出版品，儘管梅樂斯以國研所與軍統局的競爭關係，經常要求費正清不要向王芃生索取資料。<sup>94</sup>

其時中美所協定隨即因美國海軍部、戰略局不和及對合作內容發生爭議，鄧諾文不滿梅樂斯把持在華資源、情報，要求該局得派駐重慶代表，以及改善人員管理與工作分配、器材保管使用等各項，8 月中旬正式用書面提出改進意見。<sup>95</sup> 蕭勃於此前數度急電戴笠請示，主張對戰略局建議改進事不宜拒絕，所列舉理由之一，卻是王芃生派員在歐美活動已久。蕭從鄧諾文個人與戴笠的聯絡代表魯西 (Al R. Lusey) 密告得知，王近日曾托美國友人與戰略局秘密接洽，並去函托交另一駐美武官朱世明協助進行，經蕭婉詞探詢，朱亦未否認。<sup>96</sup> 顯然蕭勃預期王芃生在華府行動可能導致軍統局與美方合作案生變，感到威脅。戴笠復電除指示蕭勃在華府暫緩與戰略局作肯定協議，以免戰略局對梅樂斯不信任之表示妨礙蔣中正對軍統局有關合作之陸續呈請；戴笠並向蕭勃保證，王芃生與美方合作事不可能實現，因蔣已將其對英方合作事批示由軍統局統一辦理，惟王尚未完全交出而已，似乎戴自認已得蔣充分授權，對排除王芃生成竹在胸。<sup>97</sup>

另一方面，美國戰略局為貫徹主導中國戰區特勤事務，繼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後，

<sup>93</sup> "Gauss to Hull" (December 15, 194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 p. 761.

<sup>94</sup> John K.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2), p. 218.

<sup>95</sup> 有關軍統局與戰略局的合作協議過程，吳淑鳳，〈軍統局對美國戰略局的認識與合作開展〉，收入吳淑鳳等編，〈不可忽視的戰場〉，頁 173-201。

<sup>96</sup> 「蕭勃電戴笠」(1943 年 7 月 31 日)，〈中美合作所成立協定案(一)〉，《軍情局檔案》，國史館藏，148-010200-0012。

<sup>97</sup> 「戴笠電蕭勃」(1943 年 8 月 3 日)，〈戴公遺墨——組織類(第 5 卷)〉，《戴笠史料》，國史館藏，144-010105-0005-029。作者遍查各相關檔案全宗，戴笠所稱蔣的批示仍未得見。

鄧諾文復企圖干涉特勤處與國研所的合作關係。值此之際，特勤處高層卻收到凱瑟克轉來王芃生托交信函，表達歡迎各盟國共同加入國研所與英方的現有合作架構之意，依王之見，邀請美國參與的時機已經成熟。7月下旬，鄧諾文在倫敦與特勤處高層的協商會談中，曾一度主張英方應將特勤處組織撤出重慶、由戰略局接管中英合作項目的可能性，雙方並討論如何在王芃生與特勤處、戴笠與戰略局既有合作基礎上，形成新的美英中合作關係與情報庫，但未能取得共識。<sup>98</sup> 同一時間，外交部長宋子文訪問倫敦，亦曾會晤凱瑟克。<sup>99</sup>

特勤處高層在拖延多時後，終於在8月中旬函覆王芃生，指稱在與鄧諾文、宋子文會商後，前者傾向各自為政，後者擔憂三方利益衝突難以調和、建議維持現狀為佳，特勤處故而主張此刻三方合作事恐窒礙難行，奉勸王打消此意，不妨等待東南亞戰區司令部成立、盟軍對日作戰時程更明確後，再行考慮。<sup>100</sup> 同年12月上旬，鄧諾文造訪重慶，肯定由戴笠繼續領導執行中美所協定，並下令停止戰略局駐華人員向英國大使館武官及王芃生購買日本出版品計畫，以釐清與各組織關係，避免問題衍生；<sup>101</sup> 新任戰略局駐華代表賀夫曼 (Carl Hoffman) 隨後於重慶組織戰略局分遣隊，其首要行動為切斷戰略局與費正清的聯繫，原因之一即是費正清與王芃生的國研所過從甚密。<sup>102</sup>

### 三、國研所在英國對華情報工作地位變遷

特勤處高層顯然對王芃生隱瞞了美、英對於在華情報工作整併事的歧見。依據特勤處內部文件對資源所未來發展的規劃，特勤處在與戰略局協調攻防中，堅稱資源所為一中國政府機關，特勤處無法單方面決定該所事務，僅能將英方從該合作案

<sup>98</sup> “New Brief for SOE Negotiations with G50,000 [William Donovan]” (July 26, 1943), OSS/SOE Cooperati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65; “Meeting of 27 July 1943 between CD, G, D/Plans, AD/O and G50,000” (July 27, 1943), OSS/SOE Cooperati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65.

<sup>99</sup> 宋子文與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克拉克 (Ashley Clark)、英國政府法律顧問丹寧 (Elser Denning) 談及中國戰後重建與英商合作開展，將會晤怡和公司凱瑟克、太古集團斯威爾 (Warren Swire) 等。「與克拉克、丹寧談話紀錄」(1943年8月4日)，收入吳景平、郭岱君主編，《風雲際會——宋子文與外國人士會談紀錄(1940-194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頁108-109。

<sup>100</sup> “CD to General Wang Peng-son” (August 15, 1943), OSS/SOE Cooperati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65. 王芃生去函日期為該年6月16日。

<sup>101</sup> “Gauss to Hull” (December 15, 194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p. 761.

<sup>102</sup> Maochun Yu,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 p. 137.

所得情報與美方共享，迫不得已則求取最高代價出讓給美方。特勤處並利用蔣不願美、英在華聯手進行情報工作，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心理，向戰略局一再強調維持中英合作係出於蔣中正的意願，最終保全了以資源所為名義的合作關係，直至戰爭結束。<sup>103</sup>

8月下旬，蔣中正已預定將「芘生機構改良」。<sup>104</sup> 從往後數月間安獻今與倫敦高層往來電文可知悉，王芘生委請安獻今向倫敦表示欲調整雙方合作項目，限制資源所工作內容為調查、研究與宣傳三類，停止情報工作。所謂調查，係指透過外勤人員與日本報刊資料，蒐集彙整日本有關政治與經濟情形；研究指審慎檢視上述調查資料，評估其價值與重要性；宣傳則意指在淪陷區與日本本土進行對敵顛覆宣傳，旨在摧毀敵軍士氣。即便有關政治與經濟情形調查工作項目，王芘生亦向英方強調不用「情報」(intelligence) 字眼，而稱為「報告」(reports)。<sup>105</sup>

依據英國官方認可的特勤處在遠東發展史專著指出，特勤處與國研所結盟，儘管初期對英方而言有其用途，然而特勤處在 1944 年以前，除了透過資源所獲取日本情報、散布對日宣傳文宣品以外，在中國地區發展成果其實十分有限。凱瑟克曾言，特勤處以資金挹注國研所，實際目的是為了「開展特勤處羽翼，使其廣泛立足於東方」(to spread its wings and establish widely throughout the East)，如此特勤處與國研所的合作關係，在戰爭後期已無法滿足英方的需要。<sup>106</sup> 國研所之外，特勤處尚自 1941 年持續與中統局合作，由英方提供經費，於重慶培訓中方所徵募之南洋華僑特工，以及在緬甸、馬來亞的情報特務合作；軍統局在 1941 年底奉蔣指示研議特勤處所提協助中方特務游擊的別動軍計畫，次年 4 月即以英方缺乏誠意中止進行，1943 年中再奉蔣指示派員與安獻今接洽，安排在印度訓練特工以轉往南洋從事間諜活動。<sup>107</sup> 與此同時，國府應盟國特務機關所請商洽合作辦法，為劃明南洋淪

<sup>103</sup> "Future of RII" (July 18, 1943), OSS/SOE Cooperati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65; Richard J. 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p. 283-284.

<sup>104</sup> 《蔣中正日記》，1943 年 8 月 26 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2006C37，Box 43，Folder 7。

<sup>105</sup> "Findlay Andrew (Chungking) to Operations Executive (London)" (April 12, 1944), Research and Investment Institute (R.I.I.); Koreans; D.O.s,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40.

<sup>106</sup> Charles Cruickshank, *SOE in the Far East*, pp. 152-153.

<sup>107</sup> 馬振犢、邱錦，〈抗戰時期國民黨中統特工的對英合作〉，頁 160-186；李漢元，〈抗戰期間軍統和英國的一次情報合作〉，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 14 冊特工組織，頁 49-51。對於英國為求拓展在華情報工作，多方尋求合作對象，唐縱曾批評英國

陷區工作區域，於 1943 年 6 月擬訂「南洋淪陷區工作綱領」，配合盟軍規復南洋目的，明定南洋工作完全以特務為主，工作區域劃分以實際情形及現有部署為標準，分由中統局、軍統局指揮，軍事情報則依蔣中正指示由軍統局統一辦理，對南洋工作已不見國研所參與。<sup>108</sup>

自 1943 年底至 1944 年間，英國特勤處在中國南方沿海地區，醞釀發動數次秘密行動，包括為癱瘓日軍在香港造船所的「淡然行動」(Operation Nonchalant)、試圖載運加拿大籍華人登陸沿海的「遺忘行動」(Operation Oblivion) 等，惟成效不彰。1944 至 1945 年間，特勤處再於中國發動「悔恨行動」(Operation Remorse)，透過高價奢侈品、生活必需品、藥品等黑市交易，以及操作匯率非法兌換貨幣，獲利不貲，在淪陷區與大後方秘密布置商貿與情資網絡，爭取市場；另向中方表示願供給大量武器，在淪陷區組織地下軍，冀望藉此搶先美軍一步，進入上海等重要城市，鞏固在華利益。<sup>109</sup>

如學者畢可思指出，太平洋戰爭期間英國在華工作基本目標，悉為戰後在華恢復商業基礎，重建英國在華影響力，並重回殖民地香港。<sup>110</sup> 美、英在亞洲情報工作競爭，實則反映了史家 Christopher Thorne 等人所闡述，美、英「如此這般盟邦」，雙方層峰對二戰結束後國際秩序構想的本質差異，以及在區域戰略與政治意圖上的妥協謀劃，於印度、東南亞、中國等地各有競合：美國總統羅斯福標榜反殖民主義的道德與思想訴求，瓦解帝國主義勢力，建立持久全面的國際安全體系，以世界警察之姿締造戰後世界秩序；英國首相邱吉爾則誓言維繫大英帝國餘暉，在不斷衰落的歷史趨勢中，力謀重返遠東。<sup>111</sup> 如此美、英大國政治與情報競合格局之下，美國

---

人「到處打洞」，而中方各機構「對英情報合作問題，都是為了金錢物品，彼此的爭議，原都為此。看來亦屬好笑！徐可均表示憤慨，王芄生玩弄謀略，戴雨農希望統一！」唐縱，《蔣介石特工內幕——軍統智多星唐縱日記揭密》，頁 222、283。

<sup>108</sup> 〈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致何應欽函〉(1943 年 4 月 20 日)，《特種檔案》，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特 20/2.19；〈吳鐵城致蔣中正簽呈〉(1943 年 6 月 22 日)，《特種檔案》，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特 20/2.28。

<sup>109</sup> Charles Cruickshank, *SOE in the Far East*, pp. 154-162; Robert Bickers, "The Business of a Secret War: Operation 'Remorse' and SOE Salesmanship in Wartime China,"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4, 2001, pp. 11-36.

<sup>110</sup> Robert Bickers, "The Business of a Secret War: Operation 'Remorse' and SOE Salesmanship in Wartime China," p. 11.

<sup>111</sup> 有關太平洋戰爭期間美、英盟邦的彼此競合，英國史家 Christopher Thorne 的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為經典之作，前引 Richard J. Aldrich 近著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即沿用該書架構，聚焦美、英對日情

戰略局鄧諾文與軍統局戴笠於情報系統集中化建置觀點一致，美中合作架構逐步開展，而王芃生領導國研所則為內部人事糾葛，對外受國府其他情報機構掣肘，又無法藉由對英合作，進一步強化國研所組織職能、提升個人政治地位，發展終究受阻。

## 柒、結論

本文主旨為運用中英美官方檔案，述論王芃生領導成立國研所，在東南亞各地活動及對英情報合作，對於戰時外交發揮實質作用，為過去研究補白：其一探討王芃生於對日作戰前期為維繫國府國際運輸通道，與法越、英緬督府要人建立關係，聯繫使館、邊省當局，即時提供中央情報、對策，並多方折衝交涉；其二探討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國府對印、緬事務轉趨積極之際，王芃生所涉入對印、緬反日心戰工作規劃；末了則探討太平洋戰爭初期王芃生推動、主持中英對敵宣傳與情報合作，合作構想可前溯自 1940 年王芃生奉命負責之運用策動日、韓、臺革命勢力，其餘重點尚包括公開反日宣傳、對日軍事情報合作、敵國境內破壞活動等。在蔣中正授意下，改於國研所下設顧問室，合作範圍因而限縮。

1942 年春，盟軍在緬戰事節節敗退之際，王芃生致電蔣中正：

我軍援緬，為推行總理大亞洲主義之初步，即我黨濟弱扶傾之試煉，在求勝利，而政治尤宜自小懷柔，樹之風聲，使與倭在越相較，仁暴判然。則戰事縱有小挫，人心依然向我，不獨利可獲多助，且藉復我數千年來之東方領導權。故在印黨團政工、特務工作，似均宜以此為中心，捨小異，取大謀，棄近利，尤宜內部密切聯絡，統一運用。<sup>112</sup>

王芃生的語重心長，一則反映了此際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張，領導東方弱小民族雄

---

報作戰，分章探討雙方在亞洲各地的合作與衝突情形。余茂春在前述 *OSS in China* 一書中亦論及戰略局在中國發展所面臨特勤處的挑戰，另 E. Bruce Reynolds, *Thailand's Secret War: OSS, SOE and the Free Thai Underground During World War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則專書探討二情報機構對自由泰運動的共同扶持與各自盤算。

<sup>112</sup> 「王芃生致蔣中正電」(1942 年 3 月 3 日)，〈盟軍聯合作戰(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80103-00063-013。

心昭然若揭，其時英軍在東南亞慘敗，美、英媒體對中國戰事樂觀態度，英國官方尤難消受，王也有「英政治上層，老衰短視，難獲屬地協力」之嘆；另一方面，王所暗指黨政、特務系統各行其是、明爭暗鬥，而王自身與共黨人士關係未能釐清，皆預示了抗戰後期發展惡果。

自歐戰前夕，國府視美國為援華關鍵力量，外交戰略首重美國；而英國始終看輕國府，不歡迎中國進入強國之列，對鞏固印度及恢復東南亞殖民統治，尤難忘情，國府只能謹慎以對。與盟軍於緬戰失利同時，梅樂斯來華洽商對華情報合作，逐步形成戰略局、海軍部與戴笠所領導軍統局的合作關係；王芃生向英方表示冀望與美方共同合作，則顯然未果。英國特勤處在 1942 年撤出於中國敵占區進行破壞、顛覆行動後，與王芃生、戰略局仍維持默契，繼續以資源所名義，從中方獲取日軍動態情報，支援對日策動工作。1943 年年中，蔣中正下令，對南洋工作凡關與美、英軍事情報合作事，概交軍統局辦理，國研所與英方合作愈形消極。中日戰爭以來國府情報機構紛立，多屬臨時性質，業務分配幾經調整，部分領導者則脫離原機構屬性，其人格特質與強勢風格，深刻左右組織命運。王、戴之爭，一方面突顯了戰時國府行政體制弱化與國共內鬥愈演愈烈，一方面呈現了國際情報政治英、美競合格局下雙方實力消長。王芃生以一介情報機構負責人活躍於戰時外交實務，檔案究能還原一頁歷史樣貌。

## 徵引書目

### 一、史料

#### (一) 中文彙編

吳景平、郭岱君主編，《風雲際會——宋子文與外國人士會談紀錄(1940-194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 (二) 英文彙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

#### (三) 日記、文集、回憶錄

##### (1) 中文

《蔣中正日記》，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2006C37。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第14冊特工組織。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譯，《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三分冊。

林美莉編，《王世杰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唐縱，《蔣介石特工內幕——軍統智多星唐縱日記揭密》，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

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臺北：周知文化公司，1995。

陳爾靖編，《王芃生與臺灣抗日志士》，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

繆雲台，《繆雲台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

龔德柏，《龔德柏回憶錄》，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

##### (2) 英文

Fairbank, John 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2.

### 二、專書

#### (一) 中文

王建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外交戰略與對外政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 吳淑鳳等編輯，《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臺北：國史館，2012。
- 徐恩曾等著，《細說中統軍統》，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2。
-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編印，《中美合作所誌》，臺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2011。
- 張瑞德，《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
-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

## （二）英文

- Aldrich, Richard J.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Secret Servi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Best, Antony.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the Japanese Challenge in Asia, 1914-194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 Cruickshank, Charles. *SOE in the Far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Kerr, Pauline, and Geoffrey Wiseman. *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Reynolds, E. Bruce. *Thailand's Secret War: OSS, SOE and the Free Thai Underground During World War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Thorne, Christopher.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Wasserstein, Bernard. *Secret War in Shanghai: An Untold Story of Espionage, Intrigue, and Treason in World War II*. Boston, Mass: Houghton Mifflin, 1999.
- Yu, Maochun.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三、期刊論文

### （一）中文

- 鹿錫俊，〈國民政府對歐戰及結盟問題的應對〉，《歷史研究》，第5期（2008），頁94-116。
- 馬振犢、邱錦，〈抗戰時期國民黨中統特工的對英合作〉，《抗日戰爭研究》，第3期（2006），頁160-192。
- 許文堂，〈第二次大戰時期中、日、法在越南的衝突與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4期（2004），頁63-69。

劉曉鵬，〈敵前養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前傳，1937-197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2 期（2013），頁 145-174。

齋藤照子，〈二戰時期日軍對緬工作機構——南機關再考〉，《南洋資料譯叢》，第 2 期（2009），頁 49-56。

#### （二）英文

Bickers, Robert, "The Business of a Secret War: Operation 'Remorse' and SOE Salesmanship in Wartime China,"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4, 2001, pp. 11-36.

Scott, Len, "Secret Intelligence, Covert Action and Clandestine Diplomacy,"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2, 2004, pp. 322-341.

Van de Ven, Hans, "Introduction,"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4, 2001, pp. 1-10.

### 四、檔案

#### （一）中文

「人事登記片」，〈王芘生〉，《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臺北：國史館藏，129000001718A，1944 年。

「人事登記片」，〈羅堅白〉，《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臺北：國史館藏，129000001725A，1944 年。

「王芘生呈秘要報告」，〈日本對華軍事外交情報（五）〉，《國民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藏，001-066201-0006，1937 年 5 月 15 日。

「王芘生電蔣中正」，〈革命文獻——敵偽各情：敵情概況〉，《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20300-00002-113，1941 年 4 月 25 日。

「王芘生呈蔣中正對倭策動說帖」，〈特種情報——軍統（六）〉，《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80102-00039-021，1941 年。

「王芘生復蔣中正函」，〈特種情報——軍統（六）〉，《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80102-00039-024，1943 年 8 月 17 日。

「王芘生電蔣中正」，〈盟軍聯合作戰（八）〉，《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80103-00063-013，1942 年 3 月 3 日。

「王芘生電蔣中正」，〈一般資料——民國三十年（二）〉，《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80200-00295-012，1941 年 5 月 5 日。

「王芘生電蔣中正」，〈對英法德義關係（二）〉，《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

- 國史館藏，002-090103-00012-206，1938年。
- 「王芃生致蔣中正函」，〈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八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80200-00510-021，1938年2月20日。
- 「王芃生致蔣中正函」，〈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五）〉，《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80200-00522-008，1939年3月10日。
- 「王芃生致蔣中正函」，〈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五）〉，《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80200-00522-021，1939年4月29日。
- 「王芃生電蔣中正」，〈對英法德義關係（四）〉，《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90103-00014-126、127、129、151，1937年12月27日、1937年10月22日、1937年10月20日、1938年3月4日。
- 「王芃生電蔣中正」，〈遠征入緬（二）〉，《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90105-00007-323，1942年3月26日。
- 「王芃生致蔣中正函」，〈滇緬運輸——日軍的破壞與威脅（二）〉，《外交部檔案》，臺北：國史館藏，020-011110-0008，1940年10月11日。
- 「王芃生致蔣中正函」，〈頒贈法國人士采玉勳章（二）〉，《外交部檔案》，臺北：國史館藏，020-101800-0078，1937年。
- 「中緬文化協會副會長印度へ」，〈陸軍一般史料・重慶側資料第91号「文化」日文資料（文化団体）昭和17年迄〉，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支那-參考資料-83，1942年10月7日。
- 〈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致何應欽函〉，《特種檔案》，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特20/2.19，1943年4月20日。
- 「外交部致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函」，〈中泰問題討論會（二）〉，《外交部檔案》，臺北：國史館藏，020-010402-0004，1940年10月27日。
- 「外交部電河內總領事館函」，〈頒贈法國人士采玉勳章（二）〉，《外交部檔案》，臺北：國史館藏，020-101800-0078，1938年1月4、21、31日。
- 「売国日本人、重慶より反日放送」，〈內閣・總理府文書・各種情報資料・外国宣伝情報〉，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情00055100-085，1941年11月28日。
- 〈吳鐵城致蔣中正簽呈〉，《特種檔案》，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特20/2.28，1943年6月22日。
- 「英國大使館致外交部照會」，〈英國駐華外交人員動態（一）〉，《外交部檔案》，臺北：國史館藏，020-100400-0178，1941年12月22日、1942年1月7日。
- 「英國大使館致外交部照會」，〈英國駐華外交人員動態（三）〉，《外交部檔案》，

- 臺北：國史館藏，020-100400-0180，1944年10月30日。
- 「河內總領事館致外交部函電」，〈頒贈法國人士采玉勳章（二）〉，《外交部檔案》，臺北：國史館藏，020-101800-0078，1937年12月31日；1938年1月5、19、29日，10月6日。
- 「林蔚、陳布雷呈蔣中正報告」，〈全面抗戰（二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80103-00054-007，1943年3月9日。
- 〈侍從室第六組1940年度情報處理審核表〉、〈侍從室第六組1944年度情報處理審核表〉、〈侍從室第六組各機關報告處理審核表〉，《侍從室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762，轉引自張瑞德，《無聲的要角》，頁85-87。
- 「軍事委員會呈國民政府該會及所屬機關組織法規編制請鑒核備案」，〈軍事委員會組織法令案（六）〉，《國民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藏，001-012071-0195，1945年2月16日。
- 「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致外交部公函」，〈中國境內敵僑俘處理案（一）〉，《外交部檔案》，臺北：國史館藏，020-010118-0002，1942年5月23日。
-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致外交部函」，〈頒贈法國人士采玉勳章（二）〉，《外交部檔案》，臺北：國史館藏，020-101800-0078，1938年1月21日。
- 「國防最高會議秘書處致外交部代電」，〈中泰商務協定〉，《外交部檔案》，臺北：國史館藏，020-010404-0004，1938年4月15日。
- 「許念曾電外交部」，〈關於滇緬及滇川湘各鐵路修築事〉，《外交部檔案》，臺北：國史館藏，020-011110-0024，1938年1月8日。
- 「新加坡總領事館呈外交部」，〈頒贈法國人士采玉勳章（二）〉，《外交部檔案》，臺北：國史館藏，020-101800-0078，1938年3月8日。
- 「曾養甫、王芄生電蔣中正」，〈對英法德義關係（四）〉，《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90103-00014-114，1937年10月30日。
- 「最高調查委員會組織規程暨處務通則草案」，〈特種情報——軍統（一）〉，《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80102-00034-004，1938年。
- 「蔣中正致史密斯函、史密斯復蔣中正函」，〈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遠征軍入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20300-00019-025，1942年3月17日、27日。
- 「蔣中正與卡爾會談紀錄」，〈革命文獻——同盟國聯合作戰：蔣委員長訪印（一）〉，《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20300-00021-052，1942年2月15日。

- 「蔣中正寅陷侍秘渝電」，〈特種情報——軍統（六）〉，《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80102-00039-021，1940年3月30日。
- 「調查報告」，〈王芃生〉，《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臺北：國史館藏，129000001718A，1943年。
- 「蕭佛成致王寵惠函」，〈中泰商務協定〉，《外交部檔案》，臺北：國史館藏，020-010404-0004，1938年2月26日。
- 「蕭勃電戴笠」，〈中美合作所成立協定案（一）〉，《軍情局檔案》，臺北：國史館藏，148-010200-0012，1943年7月31日。
- 「戴笠呈蔣中正報告」，〈特種情報——軍統（一）〉，《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80102-00034-003，1938年6月6日、1938年7月。
- 「戴笠呈蔣中正」，〈特種情報——軍統（二）〉，《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002-080102-00035-001，1940年。
- 「戴笠電蕭勃」，〈戴公遺墨——組織類（第5卷）〉，《戴笠史料》，臺北：國史館藏，144-010105-0005-029，1943年8月3日。
- 「戴笠電王芃生」，〈戴公遺墨——其他類（第1卷）〉，《戴笠史料》，臺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99-0001-064，1940年5月8日。
- 「戴笠電王芃生」，〈戴公遺墨——其他類（第3卷）〉，《戴笠史料》，臺北：國史館藏，144-010199-0003-001，1939年11月7日。

（二）英文

- “Ashley Clarke to George Sansom,” Internal Situation, FO 371/35801, Lond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August 13, 1943.
- “Ashley Clarke to Geoffrey A. Wallinger,” Yatung News Reports and Other News Reports from Tibet, FO 371/41586, Lond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June 6, 1944.
- Chinese Intelligence Reports, No. 1-103, Records of SOE, Lond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41-144, 1942-1945.
- “CD to General Wang Peng-Son,” OSS/SOE Cooperation, Lond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65, August 15, 1943.
- “Foreign Office Minute by Ashley Clarke,” Extraterritoriality in Free China - Appointment of Judge, Records of Foreign Office, FO 371/31658, Lond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September 14, 1942.
- “Findlay Andrew (Chungking) to Operations Executive (London),” Research and Investment Institute (R.I.I.); Koreans; D.O.s, Lond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 HS1/140, February 16, 1944.
- “Findlay Andrew (Chungking) to Operations Executive (London),” Research and Investment Institute (R.I.I.); Koreans; D.O.s, Lond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40, April 12, 1944.
- “Future of RII,” OSS/SOE Cooperation, Lond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65, July 18, 1943.
- “G. E. Gent (Colonial Office) to Ashley Clarke,” Post-war Settlement in the Far East, FO 371/31715, Lond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July 24, 1942.
- “Meeting of 27 July 1943 between CD, G, D/Plans, AD/O and G50,000, ” OSS/SOE Cooperation, Lond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65, July 27, 1943.
- “New Brief for SOE Negotiations with G50,000 [William Donovan],” OSS/SOE Cooperation, Lond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65, July 26, 1943.
- “RII Communications China,” Research and Investment Institute (R.I.I.); Koreans; D.O.s, Lond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Records of SOE, HS1/140, October 15, 1942.
- “RII Origin-Scope-Objectives,” Research and Investment Institute (R.I.I.), Records of SOE, Lond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HS1/159, 1941.
- “Summary of Agreement between British SOE and American SO,” OSS/SOE Cooperation, Londo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S1/165, June 16-22, 1942.

(責任編輯：金京財)